

毛澤東選集

卷五

大連大眾書局印行



毛澤東選集

(五 卷)

— 元 價 定 —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四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六 月 再 版

經	印	印	著
售	刷	行	者
各	大	大	毛
埠	衆	衆	澤
大	印	書	東
書	書	店	
店	館		

目 錄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二五
反對自由主義	二五
『農村調查』序言	三二
改造我們的學習	三八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四九
反對黨八股	七五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演	九四
引 言	九五
結 論	一〇一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 戰爭中的地位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擴大的六中全會報告

(論新階段第七章)

一 問題的性質

同志們！我們有一個光明的前途，中國必須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也能够戰勝他。但由現在到達那個光明前途的中間，存在着一段艱難的路程。爲了一個光明的中國而鬥爭的我們與全民族，必須有步驟地同日寇這個黑暗勢力作戰，而要戰勝他，只有經過長期戰爭。在這個戰爭中，共產黨員處於何種地位呢？他們要怎麼樣做才算克盡其最善的努力呢？抗戰以來的經驗，我們也總結了；當前的形勢，我們也估計了；全民族的緊急任務，我們也提出了；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的理論與方法，我們也說明了；國際形勢，我們也分析了。那麼，還有什麼呢？同志們！還有一點，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處於何種地位的問題，這就是共產黨員應該怎樣認識自己，加強自己，團結自己，才算在民族戰爭中盡了自己最大責任的問題。

(2) 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

國際主義者的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同時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呢？可以的，應該的。

看什麼歷史條件來決定。有日本侵略者與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對於日本侵略者與希特勒，共產黨員是堅決反對所謂愛國主義的，日本共產黨與德國共產黨他們都是戰爭失敗主義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與希特勒的戰爭失敗，越失敗得澈底越好。日本共產黨與德國共產黨都應該這樣幹，也正在這樣幹。理由是，日本侵略者與希特勒的戰爭，是侵害世界人民也侵害其本國人民的。對於我們，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密切結合着，我們的口號是爲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對於我們，失敗主義是罪惡，全力援助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是天職，是責無旁貸，在這裡，不能有一點消極性。理由是：只有爲着保衛祖國而戰才能出全民族於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解放，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實施。爲此理由，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發揮其全部的積極性，英勇堅決地走上民族革命戰爭的戰場，拿每一槍口瞄準日本侵略者，不容有任何的消極。必須用全力援助友黨友軍，不容有任何坐觀成敗的心理。爲此理由，我們的黨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口號；後來又提出了與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命令紅軍改編爲抗日的國民革命軍開赴前綫作戰，命令自己的黨員站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綫，爲保衛祖國流最後一滴血。這些做法，這些愛國主義，一切都是正當的，應該的，必須的，正是國際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一點也沒有違背國際主義。只有政治上糊塗或別有用心的人，才會閉着眼睛

瞎說我們的做法不對，瞎說我們拋棄了國際主義。

(3) 共產黨員在民族戰爭中的模範作用

根據上述理由，共產黨員應在民族戰爭中表現其高度的積極性，而這種積極性，應使之具體表現於各方面，即應在各方面起其先鋒的與模範的作用。我們這個戰爭，是在困難環境之中進行的。這種困難環境的形成，在於我們民族的廣大生動力量至今還只在開始發動之中，大多數民衆的民族覺悟、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之不足，大多數民衆的無組織，軍力的不堅強，經濟的落後，政治的不民主化，腐敗現象與悲觀情緒的存在，統一戰綫內部團結鞏固之不足，這些都是形成困難環境的主要原因。爲此原故，共產黨員不能不自覺地擔負起團結全民提高落後的重大責任。在這裡，共產黨員的先鋒作用與模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八路軍與新四軍，應該成爲英勇作戰的模範，執行命令的模範，紀律的模範，政治工作的模範與內部團結統一的模範。共產黨員在與友黨友軍發生關係中，應該堅持統一團結的立場，堅持統一戰線的綱領，成爲實行抗戰任務的模範。應該言必信，行必果，不要傲慢態度，誠心誠意地同友黨友軍商量問題，協同工作，成爲統一戰綫中各黨相互關係的模範。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範。共產黨員在民衆運動中，應該是民衆的朋友，而不是民

衆的上司，是詢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與群衆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幹等等精神，才是值得尊敬的模範。共產黨員應與黨外一切先進份子協同一致，爲着團結全民提高落後而努力。必須懂得，共產黨員不過是全民族中一小部分，黨外存在着廣大先進份子與積極份子，我們必須和他們協同工作。那種『只有自己好，別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對的。共產黨員對於落後人們的態度，不是輕視他們，看不起他們，而是尊重他們，親近他們，團結他們，說服他們，鼓勵他們前進。共產黨員對於在工作中犯過錯誤的人們，除了不可救藥者外，不是採取排斥態度，而是採取規勸態度，使之翻然改進，棄舊圖新。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範，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範。因爲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只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因此，共產黨員又應成爲學習的模範，他們每天都是民衆的教師，但又每天都是民衆的學生，只有向民衆學習，向環境學習，向友黨友軍學習，瞭解了它們，才能對於工作實事求是，對於前途有遠見卓識。長期戰爭與艱難環境中，只有共產黨員協同友黨友軍與人民大衆中之一切先進份子，高度地發揮其先鋒的與模範的作用，才能動員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提高落後，克服困難，爲戰勝敵人、創造新中國而奮鬥。

(4) 團結全民族與反對民族陣綫中的奸細

克服困難戰勝敵人的中心任務，是團結全民族，鞏固擴大統一戰綫，發動全民族各個階層中的一切生動力量，這是唯一無二的方針。但同時，民族統一戰綫中已經存在着並且還要混進來起其破壞作用的奸細，這就是暗藏的、外表上以抗日面貌出現的那些漢奸、託派、親日派份子。共產黨員應該隨時注意這些奸細，並以真憑實據為基礎，按照具體情況，揭發這些奸細們的罪惡，同時勸告友黨友軍與人民大眾不要上他們的當。提高對於民族奸細們的政治警覺性，共產黨員負了重要的責任。揭發與清除奸細，是與擴大鞏固民族統一戰綫不能分離的。

(5) 擴大共產黨與防止奸細混入

爲了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共產黨必須擴大其組織，向着真誠革命，而又信仰黨的主義，擁護黨的政策，並願意服從紀律，努力工作的廣大工人農民與青年積極份子開門，使黨變爲偉大的帶羣衆性的黨。在這裡，關門主義傾向是不能容許的。但同時，對於奸細混入的警覺性也決不可少。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務機關，時刻企圖破壞我們的黨，時刻企圖利用暗藏的漢奸、託派、親日派、腐化份子、投機份子，裝扮積極面目，混入我們

黨裡。對於這些份子的警惕與嚴防，是一刻也不應該放鬆的。不可因為怕奸細而把自己的黨關起門來，大膽的發展黨是我們確定了的方針。但同時，又不可因為大膽發展而疏忽對於奸細與投機份子乘機侵入的警戒。『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份子侵入』，這就是我們發展黨的總方針。

(6) 堅持統一戰綫與堅持黨的獨立性

如果中國只有一個階級，一個黨派，那就再不要什麼統一戰綫。所謂統一戰綫，就是拿兩個以上的階級與黨派之存在作前提的。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才能勝敵，並須是長期的堅持，這是確定了的方針。但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綫中的任何黨派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一樣。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是什麼呢？在黨派問題上說來，就是容許聯合統一，同時又容許其獨立共存。否認獨立性，只談統一性，這是背棄民權主義的思想，不但我們共產黨不能同意，任何黨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沒有問題，統一戰綫中，獨立性不能超過統一性，而是服從統一性，統一戰綫中的獨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對的東西。不這樣做，就算堅持統一戰綫，就要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但同時，決不能抹殺這種相對的獨立性，無論思想上也好，政治上也好，組織上也好，各黨必須有相對的自由權。如果被抹

殺或自己拋棄這種相對的獨立性或自由權，也同樣將破壞團結對敵，破壞統一戰綫。這是每個共產黨員，同時也是每個友黨黨員，應該明白的。

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關係也是一樣。抗日戰爭中，一切服從抗日利益是總原則。階級鬥爭必須服從於民族鬥爭的利益與要求，而決不應是相違背。但同時，在階級社會存在的條件下，階級鬥爭不能消滅，也無法消滅，企圖根本否認階級鬥爭存在的理論是歪曲的理論。我們不是否認它，而是調節它，我們提倡的互助互讓政策，不但適用於黨派關係，基本的也適用於階級關係。爲了團結抗日，應實行一種調節各階級相互關係的恰當的政策，不應使勞苦大眾毫無政治上與生活上的保證，同時也應顧到富有者的利益，這樣去適合團結對敵的總要求。

(7) 照顧全局，照顧多數，及和同盟者一道來幹

共產黨員在領導羣衆，參加統一戰綫，並和敵人奮鬥時，照顧全局，照顧多數，及和同盟者一道幹的精神，是不可忽視的。共產黨員應該懂得以局部需要服從全局需要之必要。在局部情形看來認爲可行，而在全局看來認爲不可行時，應以局部服從全局。反之也是一樣，在局部情形看來認爲不可行，而在全局看來認爲可行時，也應以局部服從全局。這就是照顧全局的觀點。共產黨員決不可脫離羣衆的多數。置多數人的情況於不

顧，而率領少數先進隊伍單獨冒進，這是不能成功的。隨時注意組織先進份子與廣大羣衆之間的密切聯系，這就是照顧多數的觀點。在一切有同盟者存在的地方，遇事應和同盟者協同去幹，獨斷專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態度，是不對的。這些，都是共產黨員領導藝術與工作精神方面不可忽視的地方。一個好的共產黨員，應該是善於照顧全局，善於照顧多數，並善於與同盟者協同工作的，違背了這些，就不是一個好黨員。

(8) 幹部政策

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鬥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幹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十七年來，我們黨已經培養了不少的領導人才，軍事、政治、文化、黨務、民運各方面，都有了我們的骨幹，這是黨的光榮，也是全民族的光榮。但同時，現有的骨幹還不足以支撐鬥爭的大廈，還須廣大地培養人才。偉大的民族革命鬥爭中，已經湧出並正在繼續湧出無數的天才家、領導者。我們的責任，就在於組織他們，培養他們，愛護他們，並善於使用他們。『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我們不要忘記這個真理。在這裡，依靠原有幹部的基礎但不自滿於這個基礎，是必須的。因此，堅持而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幹部，應是我們的戰鬥任務。

不但關心黨的幹部，還要關心非黨幹部。黨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共產黨不能把他們置之度外。去掉孤傲習氣，善於同非黨幹部共事，真心誠意地團結他們，同時善意地給以幫助，對待他們以熱烈的同志的態度，把他們的積極性與天才組織到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中去，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畫己自封、目無餘子的態度，是不對的。

必須善於識別幹部。對於幹部長短優劣的識別，不但看他的表現，而且看他的本質，不但看他的一時一事，而且看他的全歷史與全工作，這是識別幹部的正確方法。在這裡，粗心大意，任情選性，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必須善於使用幹部。領導者的責任與工作，歸結起來，只有兩件事：出主意，用幹部。一切計劃、決議、命令、指示、文告、著述、講演等等、都屬於『出主意』一類。使這一切『主意』見之實行，必須團結幹部，推動他們去做，都屬於『用幹部』一類。這兩件事，在中國習慣上，就是所謂『用人行政』。在這個使用幹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歷來有兩個表現邪正兩派互相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一個是『任人唯親』。前者是明君賢臣用人的方針，後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方針。我們今天來說使用幹部問題，是站在革命立場上的，根本與古代有區別，但也離不開『任人唯賢』這個標準。以喜怒為愛憎，阿諛逢迎者獎，骨鯁正直者罰，在古時要不得，在我們也要不得。列寧、斯大林的幹部政策，在於以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與羣衆有密切

聯系，有獨立工作能力，積極肯幹，不爲私利等等爲標準，而不是其他。在這裡，過去張國濤的幹部政策正是相反。在張國濤，正是阿諛者獎，正直者罰，拉攏私黨，別有企圖，他的小組織派別活動，是有了深長歷史的。然而也正是他這種以個人爲中心而不以黨的政治原則爲中心的幹部政策，走到了他的目的之反面，一切幹部都脫離了他，結果剩下了張國濤寡人一名，叛黨而去，這是一個大教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政治經濟的落後性，反映到黨內，就是自由主義、個人風頭主義與派別活動等惡劣傾向的根源。估計到這種根源的存在，堅持列寧斯大林的組織路線與幹部政策，反對不正派不公道的惡劣傾向，鞏固黨在正確路線上的統一團結，這是中央以至全黨同志的責任。

必須善於愛護幹部。在黨的培養與艱苦鬥爭中創造出來的幹部，是民族的珍寶，全黨的榮譽，應爲全黨同志所尊重所愛護，各級領導機關則負有實際辦法達到愛護目的之責任。有些什麼辦法呢？第一，指導他們。這就是讓他們放手工作，使他們敢於負責。不怕犯錯誤；但同時，又適時地與恰當地給以關於工作環境、工作方針與工作方法的指示，使他們能在黨的政治路線下發揮其創造性。第二，提高他們。這就是給以學習理論與方法的機會，教育他們，使之在思想上在領導能力上較之過去提高一步。第三，檢查他們的工作。不是每天檢查，而是適時檢查，幫助他們總結經驗，糾正缺點，擴張成果。這是必要的，有委託而無檢查，及至犯了嚴重錯誤，方才加以注意，不是愛護幹部

的辦法。第四，改造他們。這就是對於有缺點的、犯錯誤的、有正確思想的幹部，用主要的說服方法，不得已時則用鬥爭方法，使他們改變過來。在這裡，耐心是必要的。在並非大的原則錯誤又非說而不服的情況下，不適當輕易地給人戴上『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意識』等等大帽子的方法，不當地輕易地採用『開展鬥爭』的方法，都是不對的。第五，照顧他們的困難。幹部的疾病問題、生活問題、家庭問題等事，黨的領導機關應給以熱忱的親切的同志的關心，漠然置之冷淡不理的態度是不對的。疾病必須醫治調養，生活求其切合工作需要，家庭問題在可能範圍內也須助其解決。一切這些，在物質環境許可的限度內給以照顧，對於激勵幹部的工作精神，團結全黨為一體的目的上，是有重要意義的。

(9) 黨的紀律

十七年來，尤其是五中全會以來的黨的鬥爭經驗，證明了有在黨內，八路軍與新四軍內，繼續堅持鐵的紀律的必要。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鬥爭。在過去，由於克服了張國濤一類破壞紀律的傾向，保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抗日戰爭的順利執行。在今後，又必須堅持這種紀律，才能團結全黨，克服新的困難，爭取新的勝利。在這裡，幾個基本原則是不能忽視的：(一)個人服

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這些就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具體實施，誰破壞了它們，誰就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誰就給了黨的統一團結與黨的革命鬥爭以極大損害。爲此原故，黨的各級領導機關，應該根據上述那些基本原則，給全黨尤其是新黨員以必要的紀律教育。過去經驗證明：有些破壞紀律的人，由於他們不懂得什麼是黨的紀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張國濤一類，則利用一部分黨員的無知以售其奸。所以紀律教育，不但在養成一般黨員服從紀律的良好作風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監督黨的領袖使之服從紀律，也有其必要。黨的紀律是帶着強制性的，但同時，它又必須是建立在黨員與幹部的自覺性上面，決不是片面的命令主義。爲此原故，從中央以至地方的領導機關，應制定一種黨規，把它當作黨的法紀之一部分。一經制定之後，就應不折不扣地實行起來，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並使之成爲全黨的模範。

（10）黨的民主

處在偉大鬥爭面前的中國共產黨，要求整個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與幹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引導鬥爭向勝利。所謂發揮積極性，不能只是一句空話，必須具體表現在領導機關、幹部與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於與善於提

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於領導機關與領導幹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等等上面。沒有這些，所謂積極性就是空的。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於黨內生活制度的民主化，沒有或缺乏民主生活，是不能達到發揮積極性之目的。大批能幹人材的創造，也只有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

由於我們國家至今還沒有民主生活，反映到黨內，就產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這種現象，實在妨礙着全黨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同時，也就影響到統一戰綫中，民衆運動中，民主化之不足。爲此原故，必須在黨內施行民主教育，使黨員懂得什麼叫做民主生活，民主制與集中制的聯系，並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這樣才能做到：一方面，確實擴大了黨內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於走到極端民主化，走到自由放任主義。

在軍隊中的黨，也須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黨員的積極性，增強軍隊的戰鬥力。但同時，軍隊黨的民主應少於地方黨的民主，應是爲着鞏固軍隊紀律與增強戰鬥力的。而不是削弱紀律與戰鬥力。在地方黨，也應是有助於鞏固黨的紀律與增強黨的戰鬥力，而不是相反的。

擴大黨內民主，是鞏固黨與發展黨的必要步驟，是使黨在偉大鬥爭中生動活躍，勝任愉快，生長新的力量，突破戰爭難關的有用的與重要的武器。

(11) 我們黨已經從兩條戰綫鬥爭中鞏固與壯大起來

十七年來，我們的黨，一般地，已經學會了使用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武器——思想上政治上及工作上的兩條戰綫鬥爭的方法，一方面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又一方面反對左傾機會主義。

五中全會以前，我們黨反對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與李立三的左傾機會主義。由於這兩次黨內鬥爭的勝利，使黨獲得了偉大的進步。五中全會以後，又有過兩次有歷史意義的黨內鬥爭，這就是遵義會議與開除張國燾。

由於遵義會議糾正了在反五次圍剿鬥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團結了黨與紅軍，使得中央與紅軍主力勝利地完成了長征，轉到了抗日的前進陣地，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新政策。由於巴西會議與延安會議（反張國燾路綫錯誤是從巴西開始而在延安完成的）反對了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使得全部紅軍會合一處，全黨更加團結起來，進行了英勇的抗日鬥爭。這兩種機會主義錯誤都是在國內戰爭中產生的，它們的特點是戰爭中的錯誤。

這兩次黨內鬥爭所得的教訓在什麼地方呢？在於：（一）由於不認識中國革命戰爭中的特點而產生的，表現於反五次圍剿鬥爭中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包含着不顧主客觀條

件的『左』的急性病傾向，這種傾向極端不利於革命戰爭，同時也不利於任何革命運動。要指出：當時的這種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上的嚴重原則錯誤。（二）張國濤的機會主義，則是革命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他的退却路線、軍閥主義與反黨行爲的綜合。只有克服了它，才能使得本質很好而且作了長期英勇鬥爭的紅軍第四方面軍尤其是它的廣大的幹部與黨員，從張國濤的機會主義統制之下解放出來，轉到中央的正確路線之下。（三）中央蘇區時期的偉大的組織工作，不論軍事建設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衆工作也好，黨的建設也好，是有大的成績的，沒有這種組織工作與前綫的英勇戰鬥相配合，要支持當時殘酷的鬥爭是不可能的。然而在當時黨的幹部政策與組織原則方面，是犯了嚴重原則錯誤的，這表現在宗派傾向，懲辦主義，與思想鬥爭中的過火政策。這是過去李立三路線的殘餘未能肅清的結果，也是當時政治上原則錯誤的結果。這些錯誤，也因遵義會議得到了糾正，使黨轉到了全般正確的幹部政策與組織原則之下來了。在張國濤的組織路線方面，則是完全離開了黨的一切原則，破壞了黨的紀律，從小組組織活動一直發展到反黨反中央反國際的行爲。中央對於張國濤的罪惡的路綫錯誤與反黨行爲，曾經盡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並圖挽救張國濤本人。但到了張國濤不但堅持不變，採取了兩面派的行爲，而且最後實行叛黨，就不得不堅決開除他的黨籍。這一開除，不但獲得了全黨的擁護，

而且獲得了一切忠實於民族解放事業的人們的擁護。共產國際已經批准了這一開除，並指出：張國濤是一個逃兵與叛徒。

以上這些教訓與成功，給了我們在今後團結全黨，鞏固思想上、政治上與組織上的一致，勝利地執行抗日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之必要的前提。我們的黨已經從兩條戰綫鬥爭中鞏固與壯大起來了。

(12) 當前的兩條戰綫鬥爭

在今後新的抗戰形勢中，政治上反對右的悲觀主義，將是頭等重要的。但同時，反對『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統一戰綫問題上，黨的組織與民衆組織問題上，則須繼續反對『左』的關門主義傾向，以便實現長期合作，發展黨，與發展民衆運動。但同時，無條件的合作，無條件的發展，這種右傾機會主義傾向也要注意，否則也就要妨礙合作，妨礙發展，而變爲投降主義的合作與無原則的發展了。

兩條戰綫鬥爭必須切合於具體對象的實際狀況，決不能抽象地看問題，一般的指出與具體的應用，是有區別的。所謂『亂戴帽子』的壞習慣，也就是說的那種抽象地應用這個方法之不對。

在反傾向鬥爭中，反對兩面派的行爲，是值得嚴重注意的。因爲兩面派行爲的最大

危險性，在於它可能發展到小組織行動，張國燾的歷史就是證據。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當面說得好聽，背後又在搗鬼，這就是兩面派行爲的實質。提高幹部與黨員對於兩面派行爲的注意力，是鞏固黨的紀律之重要的要求。

(13) 學 習

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並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說，幹部應該着重地研究這些東西，中央委員會與高級幹部尤其應該加緊研究。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使之向着勝利，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實際運動的了解，就不能有勝利。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而是當作行動的指南。不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只有這個行動指南，只有這個立場與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學，才是引導我們認識革命對象與指導革命運動的唯一正確的方針。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修養，現已較前大有進步，但還說不到普遍與深入。在這方面，我們較之若干外國的兄弟黨，未免遜色。而我們的任務，是在領導一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

大民族，進行着空前的歷史鬥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着重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我們努力罷，從我們這次擴大的六中全會之後，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更好一點。我們的工作做得還不錯，但如果不加深一步地學習理論，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只有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才有我們的勝利。因此，學習理論是勝利的條件。在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中國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同志，那將是等於打倒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同志們，我們一定要學習馬克思主義。

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發展法則，有它的民族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個，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為方法，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着重要的幫助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

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爲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爲全黨亟待瞭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爲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幹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着的一些嚴重的缺點，是應該認真除掉的。

當前運動的特點是什麼？它有什麼規律性，如何指導這個運動？這些都是最實際不過的問題。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得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也還沒有懂得中國的全部。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後頭，新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面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時刻光起眼睛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絕對於這些作認真的過細的研究，那他就不過是一個西班牙的唐·吉訶德，再加一個中國的阿Q，而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何研究？用馬克思主義的工具——唯物辯證法。向誰研究？我們的先生多得很——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本家、地主、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全世界，他們都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同時又都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該向他們或多或少的學到一點東

西。

「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須從不自滿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我們應取這種態度。」

(14) 團結全黨到團結全民族

偉大的鬥爭需要偉大的力量，團結全民族，發動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進入這個鬥爭中去，是我們確定了的方針，而要達此目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團結，是有重大作用的，是最基本的條件。遵義會議與克服張國濤錯誤之後，我們的黨是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最團結最統一的時期了。現在我們黨內，無論在政治路綫上，戰略方針上，時局估計與任務提出上，中央委員會與全黨，意見都是一致的。這種政治原則的一致，是團結的基本條件，黨員與黨員，幹部與幹部，領導者與領導者之間的相互關係，習慣上所謂人事關係，我們也學會了許多正確的恰當的方法，造成了在正確政治原則下的和衷共濟的空氣，有了更好的相互關係。由於地區的廣大，情況的複雜，工作部門的不同，不同的意見是難免的，應該的，黨內民主的實際，就是容許任何不同意見的提出與討論。也正是由於民主方法，保證着交換意見，並使之概括起來作出結論，形成全黨一致的方針。在這裡，客觀地與全面地看問題的態度，不雜主觀成見與意氣，不要片面的看問題。

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我們也逐漸的學會了，這又保證着黨的團結。我們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自以爲是的成見與意氣用事的作風，是無用的長物。經過了十七年鍛鍊的中國共產黨及它的領導人員，已經有了老鍊的作風了。所有這些，就能保證中央以至全黨的團結一致，就能在全民族中形成一個團結一致的核心與重心，推動抗戰進到勝利。同志們，全黨團結起來，全民族團結起來，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義主由自對反

日七月九年七三九一

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因為它是達到黨與革命團體的團結使之利於作戰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與革命份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

但自由主義取消思想鬥爭，主義無原則的和平，結果腐朽庸俗的作風發生，使黨與革命團體的某些組織及某些個人在政治上腐化起來。

自由主義有各種表現：

因為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發生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與親熱。或輕描淡寫的說一頓，不作澈底解決，保存一團和氣。結果有害於團體，也有害於個人。這是第一種。

不負責任的背後批評，不積極向組織建議，當面不說，背後亂說，開會不說，會後亂說。心目中沒有集體生活的原則，只有自由放任主義。這是第二種。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這是第三種。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藉口幹部政策，不顧組織紀律。這是第四種。

不是爲了團結，爲了進步，爲了事情弄好，向不正確的意見鬥爭爭論，而是個人攻擊，鬧意氣，洩私憤，圖報復。這是第五種。

聽了不正確的議論，也不爭辯，甚至聽了反革命份子的話，也不報告，泰然處之，行若無事。這是第六種。

見羣衆不宜傳，不鼓動，不演說，不調查，不詢問，不關心其痛癢，漠然置之。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把一個共產黨員混同於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這是第七種。

見損害羣衆利益的行爲不憤恨，不勸告，不制止，不解釋，聽之任之。這是第八種。

辦事不認真，無一定計劃，無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是第九種。

自以爲對革命有功，擺老資格，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做，工作隨便，學習鬆懈。這是第十種。

自己錯了，也已經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對自己採取自由主義。這是第十一種。還可以舉出一些，主要的有這十一種。

所有這些，都是自由主義的表現。

集體組織中的自由主義是十分有害的，他是一種腐蝕劑，使團結渙散，關係鬆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使革命隊伍失掉嚴密的組織與紀律，政策不能貫徹到底，黨的組織與黨所領導的羣衆發生隔離，是一種嚴重的惡劣傾向。

自由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產生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者以抽象的教條看待馬克思主義原則，他們贊成馬克思主義，但不準備實行之，或不準備完全實行之，不準備拿馬克思主義代替自己的自由主義。這些人，馬克思主義是有的，自由主義也是有的，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行的是自由主義，對人是馬克思主義，對己是自由主義，二樣貨色齊備，各有各的用處，這是一部分人的方法論。

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衝突的。它是消極的東西，客觀上起着援助敵人的作用，因為敵人是歡迎我們內部保存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性質如此，革命隊伍中不應該保留它的地位。

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積極精神，克服消極的自由主義。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犧牲個人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與羣衆的聯系，關心黨與羣衆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一個共產黨員。

一切忠誠坦白積極正直的共產黨員團結起來，反對一部分人的自由主義的傾向，把他們改變到正確的方向。這是思想戰綫的任務之一。

言序『農村調查』

日七十月三年一四九一

這個材料延至今天才付印，但尋鄖調查又遺失了。

現在黨的政策，不是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全黨應該執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應該執行即將到來的七次大會的指示。所以印這種材料，一為保存歷史陳跡，一為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的同志，很多還保存着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裡担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層的生動情況。普遍調查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柢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方法，只有這樣，才使我們具有對中國問題的最基礎知識。

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與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事情的。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塗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湖南一個，井岡山一個，早失掉了。尋鄖調查帶到延安，又不見

了。這裡印的，主要是一個興國調查，一個長岡鄉調查與一個才溪鄉調查，閱者單看這三個，就可知道如何找到材料的方法。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下級幹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及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幹部，尋鄉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一個窮了的老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長，一個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一個該縣的小獄吏。興國調查與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志與普通農民。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與錢糧師爺，就是我的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與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够，必須給與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與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羣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我再度申明：出版這個黨內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

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一般的說，中國幼階資階級產的種的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完全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工作不可。特殊的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着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與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却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的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摘，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的，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乃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依然是斯大林的話說得對：『不與實際相聯系的理論只是空洞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不與理論相聯系的實際也只是盲目的實際』。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的必要，是與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並非說我是什麼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羣衆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

習學的們我造改

月五年一四九一

這是去年五月我在延安幹部會上的一个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發表，以供同志們討論。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與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互相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於馬列主義的認識與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這是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與組織者。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

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爲之一新。抗戰以來，我黨根據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戰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與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昨天與前天的中國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

(二)

但是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在我看來，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在將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首先來說研究現狀。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國際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對於國內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收集材料與着重研究的系統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列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着。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認真的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願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却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其次來說研究歷史。雖則有少數黨員與少數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一工作，但一般是不會有組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百年的（昨天的）與古代的（前天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列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只會記誦馬、恩、列、斯的成語，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其次說到學習國際革命經驗，說到學習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許多同志似乎是爲了馬、恩、列、斯而去學馬、恩、列、斯，並不是爲了中國革命的實踐。所以學的雖多，消化不了；引證馬、恩、列、斯的成語是很會的，運用馬、恩、列、斯的立場與方法，具體地研究中國現狀與中國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與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則是不會的。這種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於中級以上幹部及青年學生，害處很大。

上面我說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列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這種作風傳播出去，害了我們許多同志。

確實的，現在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同志被這種作風帶壞了，他們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裡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着

嗎？

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特別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及外國故事（限於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抽象地搬來的。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作用，忘記了自己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了共產黨。

我們學的是馬、恩、列、斯，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恩、列、斯的方法則是直接違反馬、恩、列、斯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恩、列、斯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與實際統一。他們既然違背了馬、恩、列、斯的這條原則，於是他們自己就造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與實際分離。在學校教育中，在在職幹部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軍事特點，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子弟。在延安學了，到酈縣就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法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

『資本論』、『反杜林論』。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常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他們從先生那裡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

當然，上面我所說的是極壞的典型，不是說普遍如此。但是確實存在這種典型，而且是相當的多，害人相當的大，不可等閑視之的。

(三)

爲了反覆說明這個意思，我想將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對照地講一下。

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於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於中國昨天昨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恩、列、斯的理論，不問他與中國革命有什麼聯系；不是爲着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恩、列、斯那裡找立場找方法，而是爲理論而理論，爲馬、列而馬、列。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說：從客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爲我們行動的基礎。爲此目的，就要詳細佔有材料，

加以科學的分析及綜合的研究。我們許多人却相反，不去這樣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他們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與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現成的書本上。許多人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觀情況的研究，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這兩種人都憑主觀，忽視客觀。或作講演，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誇誇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衆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爲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是共產黨的大敵，是無產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之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真理才會抬頭，革命才會勝利，黨性才會鞏固。沒有科學態度或沒有完全的科學態度，即是說，沒有或不完全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态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

有一首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

『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柢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對於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於只知背誦教條的人，對於徒有虛名並無實學的人，對

於向馬列主義開玩笑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首對子記下來，或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裡的牆壁上。馬列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实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跳皮都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罷！

第二種：馬列主義的態度，即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把革命熱情與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而且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今天，還要懂得昨天與前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列主義，要使它與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爲着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與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列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找這根『矢』，不是爲了別的，是專門爲了要射中國革命與東方革命這個『的』的，否則這『矢』就不過是一個徒供玩好的古董，一點什麼用處也沒有。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爲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熱情。

不憑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佔有材料』，從這些事實中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排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譁衆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就是理論與實際統一的馬列主義作風，就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如果有了這種態度，那就既不是『頭重腳輕根柢淺』，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據上述意見，我有下列提議：

(一) 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依據歷史唯物論的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工作，然後引出應有的與必要的結論。爲此目的，就要引道同志們的眼光向着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研究上去。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員及其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後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誇誇其談的亂說一頓與一三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例如關於宣傳工作，如果不了解敵友我三方的宣傳狀況，我們就無法正確地決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了解，然後才

有好的處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政策，是轉變黨的作風基礎一環。

(二) 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廢除無組織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研究。

(三) 對於在職幹部教育與學校幹部教育，應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由此出發去研究馬列主義，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列主義的方法。研究馬列主義，又應以聯共黨史為中心材料，其他一切為輔助材料。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上還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工作的了。

我們走過許多錯路，但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在如此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與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這一學習問題上的改造，相信一定會有好結果的。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在黨
校開學典禮會上演的說

黨校今天開學，我慶祝這個學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講一點關於我們黨的作風的問題。

爲什麼要有革命黨？因爲世界上有敵人存在，所以要有革命黨。並且不但是普通的革命黨，而且要是共產黨這樣性質的革命黨。因爲如果沒有共產黨這樣性質的革命黨，敵人的徹底打倒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打倒敵人，我們的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脚步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那末，敵人就不會被我們打倒。

現在我們黨還有什麼問題呢？我們黨的總路綫是正確的，是沒有問題的，我們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有幾十萬黨員，他們在和人民一道，向着民族敵人作艱苦卓絕的鬥爭。這種英勇犧牲的精神，這種爲人民服務的成績，是大家看見的，是不能懷疑的。那末，究竟我們的黨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呢？還有缺點沒有呢？我講，還是有問題的，還是有缺點的，而且就某種意義上講，問題還相當嚴重。

什麼問題呢？就是有幾樣東西在一些同志的頭腦中還顯得不大正確，不大正派。

那幾樣東西呢？就是一個思想問題，一個黨內黨外的關係問題，還有一個言語文字問題。在這三個問題上，我們有些同志還有些不大正派的作風沒有去掉。這就是說，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文風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主觀主義。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宗派主義。所謂文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黨八股。這些作風不正，並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佔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種逆風，一種歪風，是從防空洞裡跑出來的。（笑聲）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是不好的，我們要把這個洞塞死，我們全黨都要來做這個塞洞工作，我們黨校也要做這個工作。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股歪風，有它的歷史根源，現在雖然不是全黨統治的東西，但是它還經常作怪，還在襲擊我們，因此，有整頓之必要，有抵制之必要，有加以分析說明之必要，有研究之必要。

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要完成打勝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也是黨的學風，文風也是黨的文風，所以都是黨風。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

誤，就會影響全民族。只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不能不被我們打倒的。

現在我來講一講主觀主義。

主觀主義是一種不正派的學風，它是反對馬列主義的，它是與共產黨不能並存的。我們要的是馬列主義的學風。所謂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學風，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既然是這樣的問題，所以學風問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個重要問題。

現在有些糊塗觀念，在許多人中間流行着。例如關於什麼是理論家，什麼是知識分子，什麼是理論與實際聯繫等等。

我們首先要問，我們黨的理論水平究竟是高還是低的呢？近來馬列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了，讀的也多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說我們黨的理論水平已經是提得很高了呢？確實，我們的理論水平比過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綫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低，非常之落後。一般說來，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與革命實踐相平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

問題，或重大問題，經過考察，上升到理論的階段。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有多少人創造了算得稱爲理論的理論，算得稱爲科學形態的、週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在經濟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一本理論書。像中國經濟的問題，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呢？能不能說我黨已經有了像樣的經濟理論家呢？實在不能說。我們讀了許多馬列主義書籍，能不能就算是有理論家呢？也不能的。因爲馬列主義是馬恩列斯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論。我們如果僅僅讀了它，但是沒有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沒有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特殊性的理論，我們就不能妄稱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如果我們身爲中國共產黨員，却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天天看，看不見，帶了眼鏡，還是看不見，看見了的只是書架子上的馬恩列斯的現成文獻，那末，我們在理論戰綫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如果我們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笑聲）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呢？大概不能算吧，這樣的『理論家』實在還是少一點好。假如一個人讀了一萬本馬恩列斯，每本又都讀了一千遍，以至於句句都背得，這還是不能算理論家的。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什麼理論家呢？是要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够依據

馬恩列斯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與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够在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假如要作這樣的理論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現在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思想方法，認真的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對每一問題加以調查研究，然後創造出理論。這個責任是担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黨校不應該是死讀馬列主義條文的，而是要能够首先精通它，然後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現在作與用百分數計算成績，那末，像讀一萬本書，每本讀了一千遍，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究竟應該算多少分數呢？我說一分也不算。（笑聲）但是，如果你能應用馬列主義觀點，說明一個二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讚，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現在我們黨校，也要定這個規矩，看他讀了馬列主義以後怎樣看中國問題，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會看的，有不會看的，這樣來分優劣，分好壞。

關於所謂『知識分子』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

不發達，所以知識分子特別寶貴。中央又作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要爭取廣大的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願意參加抗戰的，一概採取歡迎態度，這是很對的。因此知識分子就很光榮，土包子就吃不開。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於是有人說：『哈！你弄顛倒了，亂說一頓。』（笑聲）但是，同志，你別着急，我講的多少有點道理。

什麼是知識？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民族鬥爭知識也包括在裡面。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此外再也沒有別的知識了。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看那些從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裡面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呢？一個人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這些都沒有幹過，這些實踐的知識一點也沒有，他們有的只是書本知識。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為很難，至多算得一個半知識分子吧，因為他們的

知識還不完全。什呢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須知道這種知識對於他們是倒轉的，是逆行的，是片面性的，是人家證明了。而在他們則還沒有證明的。他們須知學這種知識並不那麼困難，甚至可以說是最容易的。像大司父煮飯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鹽醬醋等件合起來創造成吃的東西，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社和我們家的大司父比較起來，就有很大的區別。火大了要焦，鹽多了發苦，（笑聲）煮飯做菜真正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那末，只要你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司父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牠，牠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世界上那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所以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點。

有什麼辦法使半知識分子變為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一切僅有書本知識的人回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而對於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則回到實際研究中去，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我這樣說，難免有些人要發脾氣，他說：『照你這樣解釋，那末，馬克思也是一個半知識分子』。我說：是的，馬克思一不會殺豬，二不會耕田。但是他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又研究了商品。商品這個東西，幾百萬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視無睹。只有馬克思，偏偏研究了它，他拿了商品，這樣看，那樣看，不像我們讀聯共黨史這樣媽糊從事。他從商品的實際發展中作了分析工作，從普遍的存在中找出理論來。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歷史，研究了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了辯証唯物論、歷史唯物論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這樣，馬克思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他與半知識分子有別，他參加了實際革命運動，他回到實際中去加以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這種概括的知識就叫做理論。我們黨內需要許多同志做這樣的工作。我們黨內現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從事於這樣的理論研究工作，他們大都是聰明有為的人，這些同志我們要寶貴他們，要看重他們。但是他們的方針要對，過去的錯誤他們不要重複。他們必須拋棄教條主義，必須不停止在現成的書本上。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向客觀實際得到了證明的

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講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刮臉皮。馬列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向客觀實際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讀馬列主義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錯，這樣的人經驗很多，這是很可寶貴的，但是，如果就以經驗為滿足，那也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偏於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與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的不完全。而要把革命辦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

這樣看來，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那怕是馬列主義，也可以使他變成空洞的東西。一種是偏於感性與局部的知識，有發展成為理性的與普遍的東西，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東西。

但是，我們工農幹部要學理論，必須首先學文化，沒有文化，馬列主義理論就學不進去。學好了文化，隨時都可學習馬列主義。我幼年沒有進過什麼馬列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套，（笑聲）我識字便是從這裡學來的。譬如『學

習」兩個字，就都有了，我們可以用這兩個字來學習馬列主義。何況現在不學孔夫子，學的是新鮮的國文史地與自然常識，這些文化課學好了，到處有用。我黨中央現在強調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因為學了文化以後，政治、軍事、經濟那一門都可學。否則工農幹部雖有豐富經驗，即沒有上升到理論的可能。

由此看來，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

所以，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他們都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性的缺點，並且力求改進，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

但是這兩種主觀主義，現在我們黨內主要的還是教條主義最為危險。因為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恩列斯的面孔，嚇呼工農幹部，把土包子俘虜起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也可以嚇呼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我們如果

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書本知識的幹部，願意和有經驗的幹部相結合，願意從事實際事物的研究，可以產生許多理論與經驗結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產生許多真正的理論家。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經驗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有經驗的同志上升到理論，而避免經驗主義的錯誤。

除了『理論家』與『知識分子』兩個糊塗觀念而外，還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論與實際聯系』，在許多同志中間也是一個糊塗觀念。他們天天講『聯系』，實際上却是講『隔離』，因為他們並不去聯系。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與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却在那裡『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裡搓來搓去，連聲讚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鑑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係。馬列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否則我們為什麼要去學馬列主義呢？是不是因為我們吃了小米不得消，因此要念消食經呢？我們黨校確定要學馬列主義爲了什麼呢？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列主義不是爲着好看，也不是因爲它有什麼神秘，好像道士們到茅山學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沒有什麼好看，也沒有什麼神秘，它

只是很有用。直到現在，似乎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列主義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只要得了它，就可以毫不費氣力的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還應該作啓蒙運動。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的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麼用處呢？（笑聲）同志們，你們會知道，我這樣說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馬列主義看成教條的人，使他們大吃一驚，甦醒過來，好拿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列主義。馬恩列斯曾經反覆的講，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些人偏偏忘記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話。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拿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應用於中國，從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才叫做理論與實際相聯系。如果只是口頭上講聯系，行動上又不實行聯系，那末，講一百年也還是無益的。我們反對主觀的片面的看問題，必須攻破教條主義的主觀性與片面性。

關於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全黨的學風，今天講的就是這些。

現在我們來講一講宗派主義的問題。

由於二十年的鍛鍊，現在我們黨內並沒有統治的宗派主義了，但是宗派主義的殘餘是存在的，有對黨內的宗派主義殘餘，也有對黨外的宗派主義殘餘。對內宗派主義傾向

產生排內性，妨礙黨的統一團結。對外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剷除這兩方面的禍根，才使黨在團結全黨同志與團結全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中暢行無阻。

什麼是黨內宗派主義的殘餘呢？主要有下面幾種：

首先就是鬧獨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見局部利益，看不見全體利益，他們總是不適當地特別強調他們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總希望拿全體利益去服從他們的局部利益。他們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們忘記了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張國濤是向中央鬧獨立性的，結果鬧到叛黨，做特務去了。李立三也對共產國際鬧過獨立性，結果犯了立三路綫的錯誤。現在講的，雖然不是張國濤李立三那樣極端嚴重的宗派主義，但是這種現象必須預防，必須將各種不統一的現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顧全大局，每一黨員，每一局部工作，每一次的言論、文字或行動，均必須以全黨利益為出發點，絕對不許可違反這個原則。

鬧這類獨立性的人，常常跟他們的個人第一主義分不開，他們在個人與黨的關係問題上，往往是不正確的。他們在口頭上雖然也說尊重黨，但他們在實際上却把個人放在第一位，把黨放在第二位。劉少奇同志曾經說過，有一種人的手特別長，很會替自己個

人打算，至於別人的利益與全黨的利益呢？那是不大關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大笑）這種人鬧什麼東西呢？鬧名譽，鬧地位，鬧出風頭。在他們掌管一部分事業的時候，就要鬧獨立性。爲了這些，就要拉攏一些人，排擠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資產階級政黨的庸俗作風，也搬進共產黨裡來了。這種人吃虧就在於不老實。我想，我們應該是老老實實的辦事；在世界上要辦成幾件事，沒有老實態度是根本不行的。什麼是老實人？馬恩列斯是老實人，科學家是老實人。什麼是不老實？托洛茨基、布哈林、張國濤是大不老實，李立三也不老實，爲個人利益爲局部利益鬧獨立性的人也不老實。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自以爲得計，自以爲很聰明，其實是最蠢的人，都是沒有好結果的。我們黨校的學生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建設一個集中的統一的黨，一切無原則的派別鬥爭，都要清除乾淨。要使我们全黨的步調整齊一致，爲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我們一定要反對個人主義與宗派主義。

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關係，必須是團結的，必須反對宗派主義傾向。因爲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新四軍到後才創立的，許多地方工作是外來幹部去後才發展的，因此，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關係，必須加以很好的注意。在這種條件下，我們同志必須懂得，只有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完全團結一致，只有本地幹部大批的生長了，並提拔起來

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黨在根據地內才能生根，否則是不可能的。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必須互相取長補短，才能有進步。外來幹部比較本地幹部，對於熟悉情況與聯系羣衆這些方面，總要差些。拿我來講，就是這樣。我到陝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情形，對於與陝北人民的聯系，我比高崗同志他們就差得多。無論怎樣進行調查研究，比起陝北幹部來總是要差些。我們到山西、河北、山東以及其他抗日根據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不但如此，即在一個根據地內部，因為根據地內的各個區域有發展先後之不同，幹部中也有外來本地之別，比較先進區域的幹部到比較落後區域裡去，對於當地，也是一種外來幹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幹部的問題。就一般情形說來，凡屬外來幹部負領導責任的地方，如果與本地幹部關係弄不好，那末，這個責任主要的應該放在外來幹部的身上，主要領導的同志，他的責任就更大。現在對這個問題的注意還不够，有些人輕視本地幹部，譏笑本地幹部，他們說：『本地人懂得什麼，土包子！』這種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幹部的重要性，既不了解本地幹部的長處，也不了解自己的短處，所以採取了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態度。一切外來幹部一定要愛護本地幹部，經常幫助他們，而不是譏笑他們，打擊他們。自然，本地幹部也必須學習外來幹部的長處，必須去掉那些不適當的狹隘的觀點，以求與外來幹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義傾向。

軍隊工作幹部與地方工作幹部的關係也是如此，兩者必須完全團結一致，必須反對宗派主義傾向。軍隊幹部必須幫助地方幹部，地方幹部也必須幫助軍隊幹部，如有糾紛，應該雙方互相原諒，而各對自己作正確的自我批評。在軍隊幹部事實上居於領導地位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責任應該放在軍隊幹部的身上。這個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必須使軍隊幹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責任，以謙虛的態度對待地方幹部，方能使根據地的戰爭工作與建設工作得到順利進行的條件。

幾部分軍隊之間、幾個地方之間、幾個工作部門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必須反對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本位主義傾向。調幹部則不給，或以壞的送人，以鄰爲壑，全不爲別部別地別人想一想，這就叫做本位主義，完全失掉了共產主義的精神。不顧大局，對別部別地別人漠不關心，就是這種本位主義者的特點。對於這樣的人，必須加重教育，使他們懂得這就是一種宗派主義傾向，如果發展下去，是要危害黨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老幹部與新幹部的關係問題。抗戰以來，我黨有廣大的發展，大批新幹部也產生了，這是很好的現象。聯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報告中間說：『老幹部通常總是不多，少於需要之數，而且他們已因宇宙自然法則關係而開始局部衰老亡故。』他在這裡講了幹部狀況，又講了自然科學。我們黨如果沒有廣大的新幹部同老幹部一致合作，我們的事業就會中斷，所以一切老幹部應該以極大的熱誠歡

迎新幹部，關心新幹部。不錯，新幹部是有缺點的，他們還參加革命不久，還缺乏經驗，他們中的有些人還不免帶來舊社會不良思想的尾巴，這就是小資產階級自由思想的殘餘。但是這些缺點是可以從教育中從革命鍛鍊中逐漸去掉的。他們的長處，正如斯大林說過的，是對於新鮮事物有銳敏的感覺，因而有高度的熱情與積極性，而在這一點上，有些老幹部則正是缺乏的。新老幹部應該是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以便團結一致，進行共同的事業，必須防止宗派主義的傾向。在老幹部負主要領導責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幹部與新幹部的關係弄得不好，那末，老幹部就應該負主要的責任。

以上所講，局部與全體的關係，個人與黨的關係，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關係，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的關係，軍隊與軍隊、地方與地方、這一工作部門與那一工作部門之間的關係，老幹部與新幹部的關係，都是黨內的相互關係，都應該提高共產主義精神，防止宗派主義傾向，使我們的黨達到隊伍整齊，步調一致，以利戰鬥之目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整頓黨風，必須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如果不要主觀主義，實行馬列主義實事求是的精神，我們就必須掃除黨內宗派主義的殘餘，以黨的利益高於個人與局部的利益爲出發點，使黨達到完全統一的地步。

宗派主義的殘餘，在黨內關係上是應該消滅的，在黨外關係上也是應該消滅的，這

也是必須整頓的黨風。單是團結全黨同志還不能戰勝敵人，必須團結全國人民方能戰勝敵人。我們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上，二十年來做了艱苦的偉大的工作，抗戰以來，這個工作的成績更加偉大。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所有的同志都有了正確的作風，都沒有了宗派主義的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是確實存在着這種傾向的，有些人並且很嚴重。許多我們的同志，喜歡對黨外人員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視人家，而不願尊重人家，不願了解人家的長處，這就是宗派主義傾向。這些同志，學了幾句馬列主義之後，不是更謙虛，而是更驕傲了，總是說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實在是一知半解。我們的同志必須懂得一條真理：共產黨員和黨外人員的比例，無論何時都是佔少數，假定一百個人中有一個共產黨員，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中就有四百五十萬共產黨員，即使達到這樣大的數目，共產黨員也還是只佔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黨員，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與非黨員合作呢？對於一切願與我們合作及可能與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一部分黨員却不懂得這個道理。對於願意和我們合作的人，看不起他，甚至排斥他，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馬恩列斯給了我們這樣的根據嗎？沒有的，相反，他們總是諄諄告誡我們，要密切聯系羣衆，而不是脫離羣衆。共產黨中央給了我們這個根據嗎？沒有的，中央的一切決議案中，沒有一個決議說是我們可以脫離羣衆使自己孤立起來，相反，總是叫我們密切聯系羣衆，而不要脫離羣衆。

所以一切脫離羣衆的行動，並沒有任何的根據，只是我們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來的宗派主義思想在那裡作怪。因為這種宗派主義在一部分同志中還很嚴重，還在障礙黨的路綫的實行，所以我們要在黨內進行很大的教育，首先要從我們的幹部開始，使他們真正懂得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使他們懂得共產黨員如果不與黨外幹部、黨外人員互相聯合，敵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目的就一定不能達到。

一切宗派主義思想都是主觀主義的，都與實際革命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在反對宗派主義時，也要反對主觀主義。

關於黨八股的問題，在另外一個會議上來討論。黨八股是藏垢納污的東西，它是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於革命的，我們必須肅清它。今天不能一下講完，待下次再講。

我們要反對主觀主義，就要宣傳唯物主義，就要宣傳辯證法。但是我們黨內還有許多同志，他們並不注重宣傳唯物主義，也不宣傳辯證法。有些同志聽憑別人宣傳主觀主義，他們也安之若素。這些同志自以為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們却不努力宣傳唯物主義，聽了或看了主觀主義的東西，也不想一想，也不發議論，這種態度不是共產黨員的態度。由於這個原故，使得我們許多同志蒙受了主觀主義思想的毒害，發生麻木的現象，所以我們要在黨內發動一個啓蒙運動，使我們同志的精神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蒙

蔽中間解放出來，號召同志對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加以抵制。這些東西好像日貨。因為只有我們的敵人願意我們保存這些壞東西，使我們繼續受蔽，所以我們應該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貨一樣。一切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東西，我們都要抵制它，不要使它利用黨內理論水平低，出賣它的那一套。任何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貨色，應該使它在市場上銷售困難。爲此目的，就要提高同志們的嗅覺，對於任何東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鑑別其好壞，然後才決定歡迎它，或者抵制它。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爲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是否合乎實際，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最後，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壞的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後』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爲了救人，而不是爲了把人診死。一個人發了盲腸炎，醫生把它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任何犯錯誤的人，也不管他的錯誤犯了多大，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於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以便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爲一個好同志。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解決問

題的。思想上的毛病與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用魯莽態度，必須採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

趁着今天黨校開學的機會，我講了許多話，希望同志們加以考慮。（熱烈的鼓掌）

反 對 黨 入 股

一 九 二 四 年 二 月 八 日 演 說

剛才凱豐同志講了今天開會的宗旨。我現在想講的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怎樣奪黨八股做它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反掉，那它就還有一個藏身的地方，它還可以躲起來。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對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最後地『將一軍』，勢必弄得這兩個怪物原形畢露，『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兩個怪物也就容易消滅了。

一個人寫黨八股，如果只給自已看，那倒還不要緊。如果送給第二個人看，那已經較之自己多了一倍，已屬害人不淺。如果還要貼在牆上，或付油印，或登上報紙，或印成一本書的樣子，那問題可就大了，它可以影響許多的人。而寫黨八股的人們，却總是想給大家看的，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的。

黨八股也就是洋八股。這洋八股，魯迅是早就反對過的。我們為什麼又叫它做黨八股呢？這是因為它除了洋氣之外，還有一點土氣，也算一個創作罷！誰說我們的人一點創作也沒有呢？這就是一個！（大笑）黨八股在我們黨內已經有一個長久的歷史，特別是在內戰時期，有時竟鬧得很嚴重。

從歷史來看，黨八股是對於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
這話怎麼講？

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與民

上，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總之那時統治階級及其幫閑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內容與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醜態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五四運動不止這一個功績，它還有與這相聯系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大功績，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是它的大功績之一。但到後來就產生了洋八股、洋教條，我們黨的一些人則發展這種洋八股、洋教條成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的東西。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條。這種新八股、新教條，在我們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們今天要進行改造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這樣看來，『五四』時期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反對封建的老八股、老教條的運動，後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極端，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面，成了新八股、新教條。不是生動活潑的東西，而是死硬的東西了；不是前進的東西，而是後退的東西了；不是革命的東西，而是阻碍革命的東西了。這就是說，洋八股，或黨八股，或新八股，新教條，是五四運動本來性質的反動。但五四運動也是有缺點的。許多那時的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與民主，是很

對的；但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五四運動的發展路上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與民主的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面給了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及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這就是右翼，是形式主義向右翼的發展。但在共產黨內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走極端，馬克思主義沒有拿得穩，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這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這就是形式主觀向「左」翼的發展。這樣看來，黨八股這種東西，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因素的反動，一方面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並不是偶然的東西。我們懂得這一點是有好處的。如果「五四」時期反對老八股、老教條主義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們來批判新八股、新教條主義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這個工作，五四運動時期還不過是一個開端，要使全國人民完全脫離老八股、老教條主義的統治，還須費很大的氣力，還是今後革命改造路上的一個大工程。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另一個極端主義的束縛，洋八股、洋教條的

爲害之大，不是大家看見了的嗎？至於我們黨內一部分（當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黨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啓發，拿不正確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與發展；而對於老八股老教條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影響，以及洋八股、洋教條在全國許多人中間的影響，也就不能進行有力的鬥爭，對於這些東西的摧陷廓清，也就達不到目的。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種東西，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而是剝削階級所需要的。這些東西在我們黨內，則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於這個階層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着一條小資產階級尾巴進黨來。小資產階級革命份子的狂熱性與片面性，如果不加以節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它的表現的一種形式就是洋八股或黨八股。

要做對於這些東西的肅清工作，打掃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來必須得當，就是說要好好的說理。如果說理說得好，說得恰當，那是會有效力的。說理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的給患病者一個刺激，向他們大喝一聲，就：『你有病呀！』使患者爲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的叫他們治療。

現在來分析一下黨八股的壞處在什麼地方？我們也做照八股文章的筆法來一個『八股』，以毒攻擊，就叫做八大罪狀罷。

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我們有些同志歡喜寫長文章，但是沒有東西，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爲什麼一定要寫得那麼長，又那麼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下決心不要群衆看。因爲長而且空，群衆見了就搖頭，那裡還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負幼稚的人，在他們中間散佈壞影響，造成壞習慣。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蘇聯進行那麼大的戰爭，斯大林在七月三日發表了一篇演說，還只有我們解放日報一篇社論那樣長。要是我們的老爺寫起來，那就不得了，起碼得有十萬字。現在是全世界大戰爭時代，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延安雖然還沒有戰爭，但軍隊天天在前方打仗，後方也喚工作忙，文章太長了，有誰來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歡寫長報告，他們辛辛苦苦的寫了，送來了，其目的是要我們看的，可是怎麼敢看呢？長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麼？也不好。我們應當禁絕一切空話。但是主要的與首先的對象，是把那些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腳，趕快扔到茅廁裡去。或者有人要說：『資本論』不是很長的麼，那又怎麼辦？這是好辦的，仔細讀下去就是了。俗話說：『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又說：『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我們無論做什麼都要看情形辦理，文章和演說也是這樣。我們反對的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八股調，不是

說任何東西都以短爲好，戰爭時期固然須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內容的文章。最不應該最要反對的是言之無物的文章。演說也是一樣，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演說，也是必須停止的。

黨八股的第二條罪狀是：裝腔作勢，藉以嚇人。有些黨八股，不只是空話連篇，而且裝成一個樣子，故意嚇人，這裡面包含着很壞的毒素。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還可以說是幼稚；裝腔作勢，藉以嚇人，則不但是幼稚，簡直是無賴了。魯迅曾經批評過這種人，他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科學的東西，隨便什麼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爲科學是真理，決不怕人家駁。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東西，表現在黨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說裡面，却深怕人家駁。非常胆怯，於是就靠裝樣子嚇人，以爲這一嚇，人家就會閉口，自己就可『得勝回朝』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裝樣子嚇人，它只是老老實實地說下去和做下去。從前我們的文章和演說裡面，常常有兩個名詞：一個叫做『殘酷鬥爭』，一個叫做『無情打擊』。這種手段，用了對付敵人或敵對思想是完全必要的，但用了對付自己的同志則是錯誤的。黨內也常常有敵人和敵對思想混進來，如聯共黨史結束語第四條所說的那樣。對於這種人，毫無疑義應該採用殘酷鬥爭或無情打擊的手段，因爲那些壞人正在利用這種手段對付黨，我們如果還對他寬容，那就會正中壞人的毒計。但不能用同一手段對付偶然犯錯誤

的同志，對於這類同志，就須使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手段，這就是聯共黨史結束語第五條所說的方法。但是無論對什麼人，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為這種嚇人戰術，對敵人是毫無用處，對同志則只有損害。這種嚇人戰術，是剝削階級乃至流氓無產者所慣用的手段，無產階級不需要這類手段。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靠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至於以裝腔作勢來達到名譽、地位和『威達敏』的目的，那更是卑劣念頭，不待說的了。總之，任何機關做決定，發指示，任何同志寫文章，做演說，一概要靠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這個才能爭取革命勝利，其他都是無益的。

黨八股的第三條罪狀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早幾年，在延安城牆上，曾經看見過這樣一個標語：『工人農民聯合起來爭取抗戰勝利。』這個標語的意思並不壞，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筆不是寫的一直，而是轉了兩個灣子，寫成了工字。人字呢？在右邊脚上加了三撇，寫成了人字。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寫在抗戰時期延安這地方的牆壁上，就有些莫明其妙了。大概他的目的也是發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則就很難得到解釋。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許多人常常以為自己寫的講的人家都看得很懂，聽得很懂，其實完全不

是那麼一回事，因為他寫的和講的是黨八股，人家那裡會懂呢？『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譏笑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對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譏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爲什麼不看對象亂彈一頓呢？何況這是黨八股，簡直是老鴉聲調，却偏要向人民羣衆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衆，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衆麼？我們和無論什麼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裡面想些什麼東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麼？做宣傳工作的人，對於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就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

黨八股的第四條罪狀是：語言無味，像個瀟三。上海人叫小瀟三的那批脚色，也很像我們的黨八股，乾瀟得很，樣子十分難看。如果一編文章，一個演說，頭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像個瀟三麼？一個人七歲入小學，十幾歲入中學，二十多歲大學畢業，沒有同人民羣衆接觸過，語言不豐富，單純得很，那是難怪的。但我們是革命黨，替羣衆辦事的，如果也不學羣衆的語言，那就辦不好。現在我們有許多做宣傳工作的同志，也不學語言，他們的宣傳，乏味得很，他們的文章就沒有多少人歡喜看，他們的演說也沒有多少人歡喜聽。爲什麼語言要學，並且要用很大的氣力去學呢？因爲語言的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工不可。第一，要學人民的語言，人民的語言是很豐富的，生動活

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這種語言，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到，所以我們在寫文章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癩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第二，要學外國語言。外國人民的語言並不是洋八股，中國人抄來的時候，把它的樣子硬搬過來，就變成要死不活的洋八股了。我們不是硬搬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的工作適用的東西。因為中國語言不適用，現在我們的語言中就有許多是吸收外國的。例如今天開的幹部大會，這幹部兩個字，就是從外國學來的。我們還要多多吸收外國的新鮮東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也要吸收他們的新鮮語言。比如『黨與非黨的聯盟』這是斯大林在關於蘇聯新憲法的演說中講到的，我們就吸收在陝甘寧邊區的施政綱領裡面，講成『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如此等類，總之，我們非多多吸收外國的好東西不可。第三，我們還要學習古人的語言。現在民間的語言，大批的是由古人傳下來的。古人的語言寶庫還可以掘發，只要是還有生氣的東西我們就應該吸收，用以豐富我們的文章、演說和講話。當然我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古典，這是確定了的，但是好的合理的東西還應該吸收。現在中黨八股毒太深的人，則對於民間的、外國的、古人的有用語言，一概不接受，不肯下苦工去學。斯大林在聯共十八次大會上說：『有一部分同志，對於新鮮事物失去了感覺。』我們有些同志也是這樣，很多的新鮮事物都看不見，這個毛病必須醫治。什麼是宣傳

家？不但教員是宣傳家，新聞記者是宣傳家，文藝作者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幹部也都是宣傳家。比如軍事指揮員，他們並不對外發宣言，但是他們要和士兵講話，要和人民接洽，這不是宣傳是什麼？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只要他不是啞巴，他就總有幾句話要講的。所以我們的同志都非學習語言不可。學習各種語言中，特別是人民的語言要用功學習，人民語言中，又特別是工農兵羣衆的語言要用功學習。如果我們不學習羣衆的語言，我們就不能領導羣衆。

黨八股的第五條罪狀是：甲乙丙丁，開中藥舖。你們去看一看中藥舖，那裡的藥櫃子上有許多抽屜格子，每個格子上面貼着藥名，當歸、熟地、大黃、芒硝，應有盡有。這個方法，也被我們的同志學到了。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第一是大壹貳參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還有大A B C D，小a b c d，還有阿拉伯數字，多得很！幸虧古人外國人替我們造好了這許多符號，使我們開起中藥舖來毫不費力。一篇文章充滿了這些符號，不提出問題，不分析问题，不解決問題，不表示贊成什麼，反對甚麼，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舖，沒有什麼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說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說看問題的方法不對。現在許多同志津津有味地這個開中藥舖的方法，實在是一種最低級的最幼稚的最庸俗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標幟來分類，不是按照事物的內部聯系來分類的。單單按照

事物的外部標幟，使用一大堆互相沒有內部聯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或一個演說，或一個報告，這種辦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遊戲，也會引導人家都做這類遊戲，使人不用腦筋想問題，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質，而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那裡有沒有解決的矛盾，那裡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總得贊成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來。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對於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側面加以大略的調查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麼，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略的調查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還不能解決問題。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與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着模糊雜亂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這裡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常常問題是提出了，但還不能解決，就是因為還沒有暴露事物的內部聯系，就是因為還沒有經過這種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因而不能發現基於基本的兩個矛盾側面所發生與發展着的許多次要的矛盾側面，因而問題的面貌還不明晰，還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的解決問題。一篇文章或一次演說，如果是重要的帶指導性質的，總得要提出一個什麼問題，接着加以分析，然後綜合起來，指明問題的性質，給以解決的辦法，這樣，就不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所能濟事，因為這種幼稚的低級的庸俗的不用腦筋的形式主義方法，在我們黨內很流行，所以必須給它指

破，才能使大家學會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我們所辦的事才能辦好，我們的革命事業才能勝利。

黨八股的第六條罪狀是：不負責任，到處害人。上面所說的那些，一方面是由於幼稚而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責任心不足來的。拿洗臉作比方，我們每天都要洗臉，許多人並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後還要拿鏡子照一照，要調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你們看，這是何等的有責任心呀！我們寫文章做演說，只要像洗臉這樣負責，就差不多了。拿不出來的東西就不要拿出來，須知這是要去影響別人的思想和行動的呵！一個人偶然一天兩天不洗臉，固然也不好，洗後臉上還留着一個二個黑點，固然也不雅觀，但倒並沒有什麼大危險。寫文章做演說就不同了，這是專為影響人的，我們的同志反而隨隨便便，這就叫做輕重倒置。許多人寫文章做演說，可以不要預先研究，不要預先準備；文章寫好之後，也不多看幾遍，像洗臉之後再照鏡子一樣，就媽媽糊糊的發表出去。其結果，往往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彷彿像個才子，實則到處害人。這種責任心薄弱的壞習慣，必須改正才好。

第七條罪狀是：流毒全黨，妨害革命；第八條罪狀是：傳播出去，禍國殃民。這兩條意義自明，無須多說。這就是說，黨八股如不改革，如果聽其發展下去，其結果之嚴重，可以鬧到很壞的地步。黨八股裡面藏的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毒物，這個毒物傳

播出去，是要害黨病國的。

上面這八條，就是我們申討黨八股的檄文。

黨八股這個形式，不但不便於表現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採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語言文字的形式。這種形式，早已產生，但尚未充實，尚未獲得普遍的發展。我們破壞了洋八股、黨八股之後，新的語言文字的形式就可獲得充實，獲得普遍發展，黨的革命事業，也就可以向前推進了。

不但文章裡演說裡有黨八股，開會也有的。『一開會，二報告，三討論，四結論，五散會。』假使每地每回無大無小都要按照這個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黨八股嗎？在會場上做起『報告』來，則常常就是『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會是常常從早上開到晚上，沒有話講的人也要講一頓，不講好像對人不起。總之不看實際情形，死守着呆板的舊形式、舊習慣，這種現象，不是也應該加以改造麼？

現在許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學化、大衆化了，這是很好的。但是『化』者，澈頭澈尾澈裡澈外之謂也，有些人則連『少許』還沒有實行，却在那裡提倡『化』呢！所以我勸這些同志先辦『少許』，再去辦『化』，不然，仍舊脫離不了教條主義與黨八股，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沒有結果的。例如那些口講大衆化而實是小衆化的人，就很

要當心，如果有一天有一個什麼大衆在路上碰到他，對他說：『先生，請你化一下給我看，』就會將起軍的。如果是不但口頭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實行大衆化的人，那就要實地跟老百姓去學，否則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衆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可見他就沒有下過決心跟老百姓學，實在他的意思仍是小衆化。

今天會場上散發了一個題名『宣傳指南』的小冊，裡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勸同志們多看幾遍。

第一篇是從聯共黨史上摘下來的，講的是列寧怎樣做宣傳。其中講到列寧寫傳單的情形：『彼得堡的「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在列寧領導之下，破天荒第一次在俄國開始實行把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溶合起來。當在某一個工廠裡爆發罷工時，「鬥爭協會」——它是經過自己小組參加者而很熟悉企業裡的情形的，——立刻就以印發傳單、印發社會主義的宣言來響應。在這些傳單裏，曾揭露廠主盤剝虐待工人的事實，曾解釋工人應如何爲自己的利益而鬥爭，曾寫着工人們底要求。這些傳單把關於資本主義機體上的腐爛癥結，關於工人們底窮困生活，關於工人們異常困苦的每日由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的勞動，關於工人們底毫無權利的地位等等真實情況，揭露無餘。同時在這些傳單裏，曾提出相當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無餘』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寧在工人巴布石金參加之下，寫了第一個這樣的鼓動傳單和告彼得堡塞棉尼可夫工廠罷工工人書。」

寫一個傳單要同熟悉情況的同志商量，不然，就是列寧也寫不出的，列寧就是根據這樣的調查研究來寫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個這樣的傳單，都大大提高了工人們底精神。工人們看見了社會主義者是在幫助他們，擁護他們。」

我們是贊成列寧的麼？如果是的話，就得依照列寧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不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也不是自以為是，誇誇其談，而是要照着列寧那樣地去做。

第二篇，是從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報告中摘下來。季米特洛夫說了些什麼呢？他說：「應當學會與羣衆說話，說話時所用的語言不是書本上的公式，而是爲羣衆事業而奮鬥的戰士底語言，這種戰士底每一句話，每一息思想，都要反映出成千百萬羣衆的思想和情緒。」

「如果我們沒有學會說羣衆懂得的話，那末，廣大羣衆是不能領會我們的決議的。我們還絕對不是時常都會用簡單的語氣，具體的口吻，用羣衆懂得的譬喻，來和羣衆們說話。我們還沒有能夠拋棄那些背得爛熟的、老生常談的抽象公式。」

『實在的，你們只要看看我們的傳單、報紙、決議和提綱，就可以看到：這些刊物和文件，是寫得如何深奧啊！甚至於連我們黨的負責人員都難懂，更用不着說普通工人了。』

怎麼樣？這不是把我們的毛病講得一針見血麼？不錯，黨八股中國有，外國也有，可見是通病。（笑）但是我們總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們自己的毛病趕快治好才行。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切實領會下面一條粗淺的規則，把這條規則當作法律，當作布爾塞維克的法律：當你寫東西作演說的時候，無論何時，總要注意使每個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號召，都決心跟着你走。應當時刻注意：你究竟爲什麼人寫東西，向什麼人說話。』

這就是共產國際給我們治病的藥方，是必須遵守的，這是『法律』啊！、
第三篇，是從『魯迅全集』裡選出的，是魯迅覆北斗雜誌社討論怎樣寫文章的一封信。他說些什麼呢？他一共列舉了八條寫文章的規則，我現在抽出幾條來說一說：

第一條：『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講的是『留心各樣的事情』，不是一樣半樣的事情。講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們怎麼樣？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點就寫嗎？

第二條：『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我們怎麼樣？不是明明肚子裡沒有什麼東西硬要拉屎麼？不調查，不研究，提起筆來『硬寫』，這就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第四條：『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速寫，決不將速寫材料拉成小說。』

孔夫子提倡『再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那是封建社會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够。魯迅說『至少看兩遍』，至多呢？他沒有說，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的加以刪改，然後發表。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複雜的，它須反覆研究，才能反映恰當，在這裡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ABC。

第六條：『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我們『生造』的東西太多了，總之是『誰也不懂』。句法有長到四五十個字一句的，其中堆滿了『誰也看不懂的形容詞之類』。許多口口聲聲擁護魯迅的人們，却正是違背魯迅的啊！

最後一篇文章，是六中全會論宣傳的民族化。六中全會是一九三八年開的，我們那時曾說：『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說

在中國生活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的實際需要來談馬克思主義，縱令你把馬克思主義讀一萬本一千遍，也還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還是一個『老鼠上秤鈎，自己秤自己』的假理論家。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爲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開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幹法，我們則要把這二者緊密的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着的一些嚴重的缺點，是應該認真除掉的。』

這裡叫洋八股廢止，有些同志却實際上還在提倡；這裡叫空洞抽象的調頭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這裡叫教條主義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總之有許多人，把六中全會的決定當做耳邊風，好像是故意同它作對似的。

中央現在做了決定，一定要把洋八股、黨八股、教條主義等類，實行拋棄，所以我來講了許多。希望同志們加以考慮，加以分析，並要分析各人自己，每個人應該把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把自己想清楚了的東西，跟你的愛人商量一下，跟你的知心朋友商量一下，跟你周圍的同志們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實改掉，這就是我們的希望。

藝文安延在
話講的上會談座

一九四二年五月

十月十九日是魯迅先生逝世七週年紀念。我們特發表毛澤東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紀念這位中國文化革命的最偉大與最英勇的旗手。

——解放日報編者 一九四三年

引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間的正確關係，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於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協助，藉以打倒我們的民族敵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務。

在我們爲中國民族解放的鬪爭中，有各種的戰綫，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綫，這就是文化戰綫和軍事戰綫。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

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五四」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建文化和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奴隸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以至現在反動派只能提出所謂「以量勝質」的辦法來和新文化對抗，就是說，反動派有的是錢，雖然不出好東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藝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革命的文藝運動，在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紅軍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工作上卻沒有互相結合起來，彼此都是孤軍作戰，這是因為當時的反動派把這兩支兄弟軍隊從中隔斷了的原故。抗戰以後，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及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多起來了，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據地，並不等於與根據地人民的運動相結合，而我們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進，就要使這兩者完全結合起來。我們今天開的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爲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爲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鬭爭。爲了這個目的，有些什麼問題應該解決的呢？有這樣一些問題，就是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共產黨員還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間是否還有認識得

不正確或者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確立場。

態度問題。隨着立場，就發生我們對於各種具體事物所採取的具體態度。譬如說，歌頌呢？還有暴露呢？這就是態度問題。究竟那種態度是我們需要的？我說兩種都需要，問題是在對什麼人。有三種人，一種是敵人，一種是朋友，還有一種是自己，這就是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對於這三種人需要有三種態度。對於敵人，對於日本法西斯和一切人民的敵人，我們應該不應該給他們『歌頌』呢？絕對不應該，因為他們都是萬惡的反動派。他們在技術上也許有些優點，譬如說他們槍砲好，但是好的槍砲拿在他們手裡就是反動的。我們武裝軍隊的任務是在把他們的槍砲奪取過來，轉過去打倒他們。我們文化軍隊的任務是在暴露一切敵人的殘暴、欺騙及其必然失敗的前途，鼓勵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堅決地打到他們。對於朋友，對於各種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有聯合，有批評，有各種不同的聯合，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他們的抗戰，我們是贊成的；如果有成績，我們是贊揚的；但是如果抗戰不積極，我們就應該批評；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動的道路，那我們就要批評，就要反對。至於對人民羣衆，對人民的勞動和鬥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贊揚。人民也有缺點的，無產階級中還有許多人保留着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後的思想，這些就是他們在鬥爭中的負擔，我們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其

背上的包袱，使他們能够大踏步前進。他們在鬥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而不應該只看到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甚至敵視他們。我們所寫的東西，應該是使他們團結，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奮鬥，去掉落後東西，發揚革命的東西，而決不是相反。

對象問題，就是文藝做給誰看的問題。在邊區，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這個問題與在大後方不同，與在抗戰以前的上海不同。在上海時期，革命文藝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學生、職員、店員為主，抗戰以後的大後方，範圍曾有過一些擴大，但基本上也還是以這些人為主，因為那裡的政府把工農兵與革命文藝互相隔絕了。在我們的根據地就完全不同。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對象，是工農兵及其黨政軍幹部。根據地也有學生，但這些學生和舊式學生也不相同，他們不是過去的幹部，就是未來的幹部。各種幹部，部隊的戰士，工廠的工人，農村的農民，他們識了字，就要看書、看報，不識字的，也要看戲、看畫、唱歌、聽音樂，他們就是我們文藝作品的接受對象。即拿幹部說，你們不要以為這部分人數目少，這比大後方出一本書的讀者多得多，大後方一本書一版平常只有兩千冊，三版也才六千冊，但是根據地的幹部，單是延安能看書的就有一萬多。而且這些幹部許多都是久經鍛鍊的革命家，他們是從全國各地來的，他們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對於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向

他們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藝的接受對象是工農兵及其幹部，就發生一個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而爲要了解他們，熟悉他們，在他們裡面，在黨政機關，在農村，在工廠，在八路軍，在新四軍裡面，了解各種事情，熟悉各種事情，了解各種人，熟悉各種人，就需要做很大的工作。我們文藝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藝工作，但是這個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對於這些，以前是一種什麼情形呢？我說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什麼是不熟？人不熟，文藝工作者和自己的描寫對象與接受對象不熟，或者簡直生疏得很。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們的幹部。什麼是不懂？言語不懂，你們是知識份子的言語，他們是人民大眾的言語。我曾經說過，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麼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緒應與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應從學習羣衆的言語開始，如果連羣衆的言語都不懂，還講什麼文藝創造呢？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的一套大道理，羣衆不賞識，在羣衆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羣衆就越不買你的貨。你要羣衆了解你，你要與羣衆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鍊。在這裡，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校裡學生子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羣肩

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份子，工農兵總是比較髒的。知識份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爲是乾淨的，工農兵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爲是髒的。革命了，同工農兵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變化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與工農兵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份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爲羣衆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學習，我的意思是說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一個自命爲馬列主義的革命作家，尤其是黨員作家，必須有馬列主義的常識，但是現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譬如說，馬列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客觀決定主義，就是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却把這個問題弄顛倒了，說什麼一切應該從『愛』出發。就說愛吧，在階級社會裡，也只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麼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

抽象的人性等等。這是表明這些同志是受了資產階級很深的影響。應該很澈底地清算這種影響，很虛心地學習馬列主義。文藝工作者應該學習文藝創作，這是對的，但是馬列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文藝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此外還要學習社會，就是要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它們的相互關係和個別狀況，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藝才能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這幾個問題，當作引子，希望大家在這些問題及其他有關的問題上發表意見。

結 論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們！我們這個會在一個月裡開了三次，大家爲了追求真理，有黨的非黨的同志幾十個人講了話，發生了熱烈的爭論，把問題展開了，並且具體化了，我認爲這是對整個文學藝術運動很有益處的。

我們討論問題，應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

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我們現在討論文藝運動，也應該這樣做。

現在的事實是什麼呢？事實就是：中國打了五年的抗日戰爭；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國大地大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中的不堅決和對內的高壓政策；『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運動——這個運動在二十三年中對於革命的偉大貢獻以及它的許多缺點；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大批文藝工作者與八路軍新四軍相結合；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與大後方的文藝工作者的環境與任務的區別；目前在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中已經發生的爭論問題——這些就是實際存在的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就要在這些事實的基礎上考慮我們的問題。

那末，什麼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以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羣衆與如何為羣衆的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或這個問題解決得不適當，就會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與自己的環境任務不協調，就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從外部從內部碰到一聯串的問題，我的結論，就以這個問題為中心加以說明，同時也講到一些與此有關的其他問題。

(一)

第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的？

這個問題，在我們各個抗日根據地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同志中，似乎是已經解決了，不需要再講的了。其實不然，很多同志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於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發生和群眾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鬥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當然，現在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在一起從事於偉大解放鬥爭的大批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文藝工作者，雖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暫時的投機份子，甚至還有敵人和國民黨特務機關派來的掛着文藝招牌的奸細份子，但是除了這些人以外，却都是在爲着共同事業努力工作着，依靠這些同志，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文藝工作者，許多是抗戰以後開始從事工作的，許多則是還在抗戰以前就做了多時的革命工作，經歷過許多辛苦，並用他們的工作和作品影響了廣大群眾的，但是爲什麼還說即使這些同志中也有對於文藝是爲什麼人的問題沒有明確解決的呢？難道他們還有主張革命文藝不是爲着人民大眾而是爲着剝削者壓迫者的嗎？

誠然，爲着剝削者壓迫者的文藝是有的。文藝是爲地主階級的，這是封建文藝，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學藝術，就是這種東西。直到今天，這種文藝在中國還有頗大的勢力。文藝是爲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

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文藝是爲帝國主義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奴隸文化，奴隸文藝。還有一種文藝是爲特務機關的，可以叫做特務文藝，這種文藝的外表也可以『很革命』，但是實質却不出上面三種範圍。在我們，文藝不是爲上述種種人，而是爲人民的。我們曾說，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眾。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對於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舊形式，我們是並不拒絕利用的，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裏，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爲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那末，什麼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士兵與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爲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爲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爲武裝起來了的工農即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爲小資產階級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够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還在抗日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我們應該聯合他們，但是他們不贊成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他們都有爲他們自己的文藝，我們的文

藝不是爲着他們，他們也拒絕我們的文藝。

我們的文藝，應該爲着上面說的四種人。在這四種人裡面，工農兵又是主要的，小資產階級人數較少，革命堅決性較小，也比工農兵較有文化教養。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爲着工農兵，第二才是爲着小資產階級。在這裡，不應該把小資產階級提到第一位，把工農兵降到第二位。而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同志的問題，他們對於文藝是爲什麼人的問題不能正確解決的關鍵，正在這裡。我這樣說，不是說在理論上。在現論上，就是說在口頭上，我們隊伍中沒有一個人把工農兵看得比小資產階級還不重要的。我是說在實際上，在行動上。在實際上，在行動上，他們是否對小資產者比對工農兵還更看得重些呢？我以爲是這樣。有許多同志比較地注重研究知識份子，分析他們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現他們，原諒並辯護他們的缺點，而不是引導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農兵，去參加工農兵的實際鬥爭，去表現工農兵，去教育工農兵。有許多同志，因爲他們自己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自己是知識份子，於是就只在知識份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與描寫知識份子上面。這種研究與描寫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那是應該的。但他們並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我們是在相當多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看見這種東西。他們在許多時候，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寄與

滿腔的同情，連小資產階級的缺點也加以同情甚至鼓吹。對於工農兵，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衣服是工農兵，面孔却是小資產階級。他們在某些方面也愛工農兵，也愛工農兵出身的幹部，但有些時候不愛，有些地方不愛，不愛他們的感情，不愛他們的姿態，不愛他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牆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民間語言等）。他們有時也愛這些東西，那是爲着獵奇，爲着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爲着追求其中落後的東西而愛的。有時就公開地鄙棄它們，而偏愛知識份子，偏愛小資產階級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這些同志的屁股還是坐在小資產階級方面，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王國。這樣，爲什麼人的問題他們就還是沒有解決，或者沒有明確地解決。這不光是講初來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過前方，在根據地八路军、新四軍做過幾年工作的人，也是沒有澈底的解決。要澈底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樣長，我們却必須解決它，必須明確地澈底地解決它。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屁股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爲工農兵的文藝。

爲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志間的爭論、紛岐

、對立、不團結，並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無原則的問題上。而對於這個原則問題，爭論的雙方倒是沒有什麼分歧，倒是幾乎一致的，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羣衆的傾向，我說某種程度，因為一般地說，這些同志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羣衆，與國民黨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羣衆，是有些不同的，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傾向是有的，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譬如說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吧，這也是原則問題，但是要去掉宗派主義，也只有把爲工農、爲八路軍、新四軍、到羣衆中去的口號提出來，並加以切實的實行，才能達到目的，否則宗派主義問題是斷然不能解決的。魯迅曾說：革命文藝戰綫的不統一是因為缺乏共同的目的，而這個共同目的就是爲工農。這個問題那時上海有、現在重慶也有，在那些地方，這個問題很難徹底解決，因爲那些地方有人壓迫革命文藝家，不讓他們有到工農兵羣衆中去的自由。在我們這裡，情形就完全兩樣，我們是鼓勵革命文藝家積極地親近工農兵，給他們以到羣衆中去的完全自由，給他們以創作真正革命文藝的完全自由，所以這個問題在我們這裡，是接近於解決的了。接近於解決不等於完全的徹底的解決，我們說要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就是爲着完全地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說的馬列主義，是羣衆生活羣衆鬥爭裡完全適用的活的馬列主義，不是單單書本上的馬列主義。把書本上的馬列主義以到羣衆中去，成了活的馬列主義，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了。不但宗

派主義的問題可以解決，其他的許多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

(二)

爲什麼人的問題解決了，如何爲法，這是第二個問題。用同志們的話來說，就是：努力於提高呢？還是努力於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過去，是相當地或是嚴重地輕視了和忽視了普及，他們不適當地太強調了提高。提高是應該強調的，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那就錯了。我前面說的沒有明確地解決爲什麼人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也表現出來了。因爲沒有弄清楚爲什麼人，他們所說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沒有正確的標準，當然更找不到兩者的正確關係。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爲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用什麼東西向他們普及呢？用封建的東西嗎？用資產階級的東西嗎？用小資產階級的東西嗎？都不行，只有用工農兵自己的東西，因此在教育工農兵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提高的問題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個基礎，譬如一桶水，不是從地上去提高，難道是從空中去提高嗎？那末所謂文藝的提高，是從什麼基礎上去提高呢？從封建階級的基礎嗎？從資產階級的基礎嗎？從小資產階級的基礎嗎？都不是，只是從工農兵的基礎，從工農兵的現有文化水平與萌芽狀態的文藝的基礎上去提高。

。也不是把工農兵提到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而這裡也就提出了學習工農兵的任務。只有從工農兵出發，我們對於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確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確關係。

普及也好，提高也好，它們的源泉是從何而來的呢？無論是那一等級的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人民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結果，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結果。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着文學藝術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它們使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相形見绌，它們是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只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沒有第二個源泉。有人說，書本上的文藝作品，古代的和外國的文藝作品，不也是源泉嗎？也可以說是源泉吧，但這是第二位的而不是第一位的，如果以這為第一位，便是顛倒的看法。實際上，書本和現成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與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見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加工製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必須批判地吸收這些東西，作為我們的借鑑，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加工成為觀念形態上的文學藝術作品時候的借鑑。有這個借鑑與沒有這個借鑑是不同的，這裡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借鑑古人與外國人，那怕是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東

西也必須借鑑。但這僅僅是借鑑而不是替代，這是決不能替代的。文學藝術中對於死人與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模倣與替代，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與藝術教條主義，和軍事上政治上哲學上經濟學上的教條主義的性質是一樣的。中國的革命的文學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羣衆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到工農兵羣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羣衆，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自然形態的文學和藝術，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加工過程即創作過程，這樣地把原料與生產，把研究過程與創作過程統一起來。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沒有原料或半製品，你就無從加工，你就只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裡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自然形態上的文學藝術雖是觀念形態上的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地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爲什麼呢？因爲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加工後的文藝却比自然形態上的文藝更有組織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活的列寧比小說戲劇電影裡的列寧不知生動豐富得多少倍，但是活的列寧一天到晚做的事情太多，還要做許多完全和旁人一樣的事，而且能夠看見列寧的人很少，列寧死後大家再也看不見他了。在這些方面，小說戲

劇電影裏的列寧就比活的列寧強。革命的小說戲劇電影等類，可以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面是人們受飢餓受壓迫，一方面是剝削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着，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現象組織起來，集中起來，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加工的文藝，只有自然形態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普及的文藝與提高的文藝都是加工過的文藝，那末它們還有什麼區別呢？有程度上的區別。普及的文藝是指加工較少、較粗糙，因此也較易爲目前廣大人民群眾所迅速接受的東西，而提高的文藝則是指加工較多，較細緻，因此也較難爲目前廣大人民所迅速接受的東西。現在工農兵面前的問題，是他們正在與敵人作殘酷鬥爭，而他們由於長期的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統治，不識字，愚昧，無文化，所以他們的迫切要求就是提高他們所急需的與所能迅速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向他們作普遍的啓蒙運動，去提高他們的鬥爭熱情與勝利信心，加強他們的團結，使他們同心同德地去和敵人作鬥爭。對於他們，第一步不是『錦上添花』的問題，而是『雪中送炭』的問題。所以對於人民，第一步最嚴重最中心的任務是普及工作，而不是提高工作。輕視忽視普及工作的態度是

錯誤的。

但是普及工作與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普及者若不高於被普及者，則普及還有什麼意義呢？普及若是永遠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一月兩月三月，一年兩年三年，總是一樣的貨色，總是一樣的『小放牛』，總是一樣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普及者與被普及者豈不都是半斤八兩？這種普及豈不又變成沒有意義了嗎？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這裡，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這種提高，不是在空中提高，不是關門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這種提高，為普及所決定，同時又給普及以指導。就中國範圍來說，革命和革命文化的發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漸推廣的，一處普及了，並且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了，別處還沒有開始普及。因此一處由普及而提高的經驗可以應用於別處，使別處的普及工作與提高工作得到指導，少走許多彎路。就國際範圍來說，外國的經驗，尤其是蘇聯的經驗，只要是好的，也有指導我們普及工作與提高工作的作用。所以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但是一切提高工作的指導作用，都不是硬搬，硬搬只會起破壞作用的。

除了直接為群眾所需要的提高以外，還有一種間接為群眾所需要的提高，這就是幹部所需要的提高。幹部是群眾中的先進份子，他們一般都已受過群眾所受的教育，他們

的接受能力比羣衆高，因此他們不能滿足於當前的和羣衆同一水平的普及工作，不能滿足於『小放牛』等等。比較高級的文學藝術，對於他們是完全必要的，忽視這一點是錯誤的。但是這種需要，暫時還只是幹部的需要，而不是羣衆的普遍需要；適應這種需要應該是一個方針，但是不應該成爲今天的整個方針或今天的中心方針。同時應該了解，爲幹部，也完全是爲羣衆，因爲只有經過幹部才能去教育羣衆，指導羣衆。如果違背了這個目的，如果我們給予幹部的並不能幫助幹部去教育羣衆，指導羣衆，那末，我們的提高工作就是無的放矢，就是離開了我們爲人民大衆的根本原則。

總起來說，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的原料，經過革命作家的加工而形成觀念形態上的爲人民大衆的文學藝術；在這種文學藝術中間，既有從低級程度的羣衆文學羣衆藝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爲被提高了的羣衆所需要、或首先爲羣衆中的幹部所需要的比較高級程度的羣衆文學羣衆藝術，又有反轉來在這種高級程度的羣衆文學羣衆藝術指導下的、爲今日最廣大羣衆所最先需要的比較低級程度的羣衆文學羣衆藝術（不是所謂低級趣味）。無論高級的或低級的，我們文學藝術都是爲人民爲大衆的，首先是爲工農兵的，爲工農兵而創作，爲工農兵所利用的。

我們既然解決了提高與普及的關係問題，則專門家與做普及工作的同志的關係問題也就可以隨着解決了。我們的專門家不但是爲了幹部，主要地還是爲了羣衆。高爾基在

主編工廠史，在指導農村通訊，在指導十幾歲的兒童，魯迅也用了許多時間與普通學生通訊。我們的文學專門家應該注意羣衆的牆報，注意軍隊與農村中的通訊文學。我們的戲劇專門家應該注意軍隊與農村中的小劇團。我們的音樂專門家應該注意羣衆的歌唱。我們的美術專門家應該注意羣衆的美術。一切這些同志都應該和在羣衆中做最低級的文學藝術普及工作的同志發生密切的聯系，一方面幫助他們，指導他們，一方面又向他們學習，從他們吸收羣衆的養料，把自己充實起來，豐富起來，哺養起來，使自己的專門不成其爲脫離羣衆、脫離實際、毫無內容、毫無生氣的空中樓閣。我們應該尊重專門家，專門家對於我們的事業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我們應該告訴他們說，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系羣衆，表現羣衆，把自己當作羣衆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只有代表羣衆才能教育羣衆，只有做羣衆的學生才能做羣衆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羣衆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羣衆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的這種態度是不是功利主義的？唯物主義者並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對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是私自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世界上沒有什麼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裡，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

義者，我們是以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羣衆的目前利益與將來利益的統一爲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與最遠爲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與目前的行會主義的功利主義者。例如某種作品，只爲自己以及幾個朋友或少數人的集團所偏愛，而爲多數人所不需要，甚至對多數人有害，硬要拿來上市，拿來向羣衆宣傳，以求其個人的或狹隘集團的功利，還要責備羣衆的功利主義，這就不但侮辱羣衆，也太無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在較多的人們中發生較大的益處，才是較好的東西。就算你的是『陽春白雪』吧，這也是貴族享用的東西，羣衆還是在那裡唱『下里巴人』，你不去提高它，只願罵人，那就怎麼罵也是空的。現在是『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統一的問題，是提高與普及統一的問題。不統一，任何專門家的最高級的藝術也不免成爲最狹隘的功利主義，要說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爲清高，羣衆是不會批准的。

在爲工農兵與怎樣爲工農兵的基本方針問題解決之後，其他一切問題，例如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對象問題，題材問題，寫光明與寫黑暗的問題，團結還是不團結的問題，功利主義還是超功利主義的問題，狹隘功利主義還是遠大功利主義的問題，便都一齊解決了。如果我們同意這個基本方針，則我們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我們的文學藝術學校，文學藝術刊物，文學藝術團體和一切文學藝術活動，就應該爲這個方針而服務。離開

這個方針就是錯誤的，和這個方針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須加以適當的修正。

(三)

我們的文藝既然是爲人民大眾的，那末，我們就可以進而討論一個黨內關係的問題，黨的文藝工作與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問題，和另一個黨外關係的問題，黨的文藝工作與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係問題——文藝界統一戰綫問題。

先說第一個問題。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藝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一定的黨，即一定的政治路綫的。爲藝術的藝術，超階級超黨的藝術，與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在有階級有黨的社會裡，藝術既然服從階級，服從黨，當然就要服從階級與黨的政治要求，服從一定革命時期的革命任務，離開了這個，就離開了羣衆的根本的需要。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機器中的螺絲釘』。因此，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反對這種擺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或多元論，而其實質就像托洛茨基那樣：『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資產階級的。』我們不贊成把文藝的重要性過分強調，但也不贊成把文藝的重要性估計不足。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偉大影響於政治。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螺絲釘，與別的部

分比較起來，自然有輕重緩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對於整個機器不可缺少的螺絲釘，對於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連最廣義最普通的文學藝術也沒有，那革命就不能進行，就不能勝利，不認識這一點，是不對的。還有，我們所說的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羣衆的政治而言，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論革命的與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爲。思想戰爭與藝術戰爭，尤其革命的思想戰爭與革命的藝術戰爭，必須服從於政治戰爭，因爲只有經過政治，階級與羣衆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現出來。革命的政治家們，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學或政治藝術的政治專門家們，他們只是千千萬萬的羣衆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務在於把羣衆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鍊，再使之回到羣衆中去，爲羣衆所領受，所實踐，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只此一家，並無分店的那種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這是無產階級政治家與有產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別，也是無產階級政治與有產階級政治的原則區別。不認識這一點，把無產階級政治與政治家狹隘化，庸俗化，也是不對的。

再說文藝界的統一戰綫問題。文藝服從於政治，今天中國政治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抗日，因此黨的文藝工作者首先應該在抗日這一點上與黨外的一切文學家藝術家（從黨的同情份子、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家到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文藝家）團結起來。其次，應

該在民主一點上團結起來，在這一點上，有一部分文藝家就不贊成，因此團結的範圍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應該在文藝界的特殊問題——藝術作風一點上團結起來。我們是主張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贊成，這個團結的範圍大概會更小些。在一個問題上有團結，在另一個問題上就有鬥爭，有批評。各個問題是彼此分開而又聯系的，因而就在生產團結的問題譬如抗日的問題上也就同時有鬥爭，有批評。在一個統一的戰綫裡面，只有團結而無鬥爭，或者只有鬥爭而無團結，而實行如過去某些同志所實行的右傾的投降主義、尾巴主義，或者『左』傾的排外主義、宗派主義，都是列寧所謂跛了腳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是如此。

在文藝界統一戰綫的各種力量裡面，小資產階級文藝家在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力量。他們的思想與作品都有很多缺點，但是他們比較地傾向於革命，比較地接近於工農兵。因此，幫助他們克服缺點，爭取他們到爲工農兵大衆服務的戰綫上來，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任務。

(四)

文藝界的主要鬥爭方法之一，就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應該發展，過去這方面工作做得不夠，同志們指出這一點是對的。文藝批評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許多專門的研

究。我這裡只談一個基本的批評標準問題，此外對於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零星問題和一些不正確的觀點，也來略為說一說我的意見。

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按照政治標準來說，一切利於抗戰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都是好的或較好的；而一切不利於抗戰團結的，鼓勵群眾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着人們倒退的東西，都是壞的，或較壞的。這裡所說的好壞，究竟是看動機（主觀願望）？還是看效果（社會實踐）呢？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與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與效果的統一論者。為大衆的動機與被大衆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為個人的動機與狹隘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為大衆的動機但無被大衆歡迎對大衆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作品）在社會大衆中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是檢驗主觀願望的標準，效果是檢驗動機的標準。我們的文藝批評是不要宗派主義的，在抗戰團結的大原則下，我們應該容許包含各種各色政治態度的文藝作品；但是我們的批評又是堅持原則立場的，對於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衆、反共的觀點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因為這些所謂文藝，其動機，其效果，都是破壞抗戰團結的。按照藝術標準來說，一切藝術性較高

的，是好的，或較好的；藝術性較低的，則是壞的。或較壞的。這種分別，當然也要看社會效果。文藝家幾乎沒有不以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們的批評，也應該容許各種各色藝術品的自由競爭；但是按照藝術科學的標準給以正確的批判，使較低級的藝術逐漸提高成爲較高級的藝術，使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即使是很高級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標準，又是藝術標準，這兩者的關係怎麼樣呢？政治並不等於藝術，一般的世界觀也並不等於藝術創作的的方法論。我們不但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政治標準，也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藝術標準，各個階級社會與各個階級社會中的各別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標準與不同的藝術標準。但是無論什麼樣的階級社會與無論什麼階級社會中的各別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不管其藝術程度怎樣高，總是排斥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排斥其反動的政治性，而只批判地吸收其藝術性。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動的東西，也可能有某種藝術性，例如，法西斯的文藝就是這樣。內容愈反動的作品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沒落時期一切剝削階級文藝的共同特點，就是其反動政治內容與其藝術形式的矛盾。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與藝術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與盡可能高度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

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內容有害的藝術品，也反對只講內容不講形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我們應該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綫鬥爭。

這兩種傾向，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是存在着的。許多同志有着忽視藝術的傾向，因此應該注意藝術的提高。但是現在更成爲問題的，我以爲還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識，所以發生了各種糊塗觀念。讓我舉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論』。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就是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抽象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則主張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却說成爲唯一的人性，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於人性。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爲文藝理論基礎的所謂『人性論』，就是這樣講，這是完全錯誤的。

『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愛可以是出發點，但是更有一個基本出發點。愛是觀念的東西，是客觀實踐的產物，我們根本上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客觀實踐出發。我們知識份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愛無產階級，是社會使我們與無產階級處於同一命運，和我們的生活與無產階級打成一片的結果。我們恨日本帝國主義，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結果。世上決沒有無原無故的愛，也沒有無原無故的恨。至於所謂『

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裂成爲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統治階級提倡這個東西，孔夫子提倡這個東西，托爾斯泰也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爲它在階級社會裡是不可能實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後。階級使社會歸於分裂，階級消滅後社會復歸於統一，那時就有了整個的人類之愛，但在現時則還是沒有。我們不能愛法西斯，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醜惡現象，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就是人們的常識，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還有不懂得麼？

『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與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這裡包含着許多糊塗觀念。文藝作品並沒有從來都這樣。許多小資產階級作家並沒有找到過光明，他們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稱爲『暴露文學』；還有簡直是專門宣傳悲觀厭世的。相反，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爲主，他們也寫些工作中的缺點，但是這種缺點只能成爲整個光明的陪襯，並不是所謂『一半對一半』。反動時期資產階級文藝家把革命羣衆寫成暴徒，把他們自己寫成神聖，所謂光明與黑暗是顛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藝家才能正確地解決歌頌與暴露的問題。一切危害人民羣衆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羣衆的革命鬥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於暴露』。這種講法和前一種一樣，都是缺乏歷史科學、缺

之歷史唯物論的見解。從來的文藝並不單在於暴露，前面已經講過。對於革命的文藝家，暴露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而不能是人民大眾。人民大眾也是有缺點的，但人民的缺點主要地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統治他們的結果，我們革命的文藝家們只應該把它作爲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的罪惡去暴露，而不應該是什麼『暴露人民』。對於人民，只是一個教育和提高他們的問題。除非是反革命文藝家，才有所謂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羣衆是『專制暴徒』之類的描寫。

『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把雜文和魯迅筆法僅僅當作諷刺來說，這個意見也。只有對於人民的敵人才是對的。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故以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需要尖銳地嘲笑法西斯主義和中國的反動派，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特務份子以民主自由的陝甘寧邊區及各敵後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和魯迅一樣，可以大聲疾呼，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能看懂。如果不是對於人民的敵人，而是對於人民自己，那末，『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會嘲笑和攻擊過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筆法也和對於敵人的完全兩樣。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用對付敵人時所需要的刻毒手法來對付同志，就是把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

諷刺？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朋友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三種態度各不相同。我們並不一定廢除諷刺，但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我是不歌頌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劃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劃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劃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決定渺小，這難道不是文藝史上的事實嗎？對於人民，這個世界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於人民的事業，並無熱情，對於人民及其先鋒隊的戰鬥和勝利，抱着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的愛人，再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裡的幾個脚色。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願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勇氣鬥爭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關於動機與效果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現在要

問：效果問題是不是立場問題？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立場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要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真正的好心，必須對於自己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或者叫做表現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共產黨人的自我批評方法，就是這樣採取的。只有這種立場，才是正確的立場。同時也只有在這種嚴肅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進一步地懂得正確的立場是什麼東西，才能一步進一步地掌握正確的立場。如果不在實踐中向這個方向前進，只是自以為是，說是『懂得』，其實是並沒有懂得的。

『學習馬列主義就是重複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學習馬列主義，不過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並不是要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馬列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空洞乾燥的教條公式是要破壞創作情緒的，但是它們不但破壞創作情緒，而且首先

破壞了馬列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列主義並不是馬列主義，而是反對馬列主義的。那末，馬列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爲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於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爲是應該的，應該澈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

(五)

我們延安文藝界中存在着上述種種問題，這是說明一個什麼事實呢？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文藝界中還嚴重地存在着三風不正的東西，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的唯心論、洋教條、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衆等等的缺點，需要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

我們有許多同志還不大清楚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區別。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完全沒有入黨的人，頭腦裡還裝着許多剝削階級的髒東西，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黨。他們想：什麼無產階級思想，還不是那一套？他們那裡知道要得到這一

套並不容易，有些人就一輩子也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只有離開黨完事。當然還有一種比這更壞的人，就是組織上加入的也是日本黨、汪精衛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特務黨，但是他們隨後又鑽進了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組織，掛着『黨員』和『革命者』的招牌。因此我們的黨，我們的隊伍，雖然其中極大多數都是純潔的，但是爲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把內部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而爲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延安文藝界現在已經展開了思想鬥爭，這是很必要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向他們大喝一聲，說：『同志』們，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是不能遷就你們的，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亡頭的危險。只能依誰呢？只能依照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我們希望文藝界的同志們認識這一場大論戰的嚴重性，積極起來參加這個鬥爭，向敵人，向朋友，向同志，向自己，使每個同志都健全起來，使我們整個隊伍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真正統一起來，鞏固起來。

因爲思想上有許多問題，我們有許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區別根據地和非根據地，

並由此弄出許多錯誤。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來的，從亭子間到根據地，不但是兩種地區，而且是兩個歷史時代。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一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到了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未有的工農兵和人民大眾當權的朝代，我們周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必須和新的羣衆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如果同志們在新的羣衆中間，還是像我上次說的『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鄉要發生困難，不下鄉，就在延安，也要發生困難的。有同志想：我還是爲大後方的讀者寫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國意義』。這個想法，是完全不正確的。大後方也是變的，大後方的讀者，不需要從根據地的作家聽那些早已聽厭的老故事，他們希望根據地的作家告訴他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爲根據地羣衆的作品，才愈有全國意義。法捷也夫的『毀滅』，只寫了一支很小的游擊隊，它並沒有想去投合舊世界讀者的口味，但是却得到了全世界的影響。中國是向前的，不是向後的，領導中國前進的是革命的根據地，不是任何落後倒退的地方，同志們在整風中間，首先要認識這一個根本問題。

既然必須和新的羣衆的時代相結合，就必須徹底解決個人與羣衆的關係問題。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應該成爲我們的座右銘。『千夫』

就是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就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達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知識份子要與羣衆結合，要爲羣衆服務，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決心，這些要求是能够達到的。

今天我所講的，只是我們文藝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方向問題，還有許多具體問題需要今後繼續研究。我相信，同志們是有決心走這個方向的。我相信，同志們在整風過程中，在今後長期的學習與工作中間，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創造出許多爲工農兵和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作品，一定能够把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和全中國的文藝運動推進到一個光輝的新階段。

